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9·4

甘肃史志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2019年第4期
(总第40期)
2019年12月出版

甘肃史志

主办单位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目 录

GAN SU SHI ZHI MU LU

【特 载】

- (4)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史海钩沉】

- (11) 华 丹 陈 谦 “西域雄狮”
——张仪潮收复河西走廊始末
- (16) 李清凌 汉匈战争和河西四郡的建立

【史地考述】

- (21) 郝 玥 张绍冬
《诗经·大雅·绵》“虞”“芮”地望考辨
- (26) 张文彩 定西乌龙关考证
- (32) 车安宁 山丹马场的历史沿革
- (35) 魏泽民 “仇池”地名读音辨正

【文化传承】

- (42) 李安乐 图式、空间及艺术
——静宁县威戎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研究

治家之范本

——读陈贵辉《陈家沟延鼎家史》

陈金有 (52)

平凉医药发展史述略

赵志飞 (54)

【志鉴编研】

对开创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的思考

张克非 (64)

浅议地方综合年鉴条目关联

常登成 (67)

【人物春秋】

甘肃抗日功臣朱青选、唐国桢夫妇

朱毓麒 (70)

幸邦隆与华亭史志

严世文 (74)

《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先生纪念碑》及其人其事

张国藩 (77)

【志鉴信息】

《华亭县志》出版发行

(20)

天水市秦州区《秦州地情丛书》第二部出版发行

(69)

甘肃省6部年鉴获第六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

通报表扬

(73)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

张军利

副主任:

郝宗维 李振宇 徐大武

张正龙 石为怀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生 牛述林 毛兴东

朱克雄 李宽余 何成才

汪举红 张占社 张军平

陈 谦 郑天水 罗文擘

易效德 赵存福 贺红梅

高 中 高生军 梁兴明

彭晓峰 雷 丽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

张正龙

副主编:

张占社 牛建文

编 辑:

王 华 李佳潞 蒋文涛

贾小炎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按：2019年6月16日出版的《求是》第12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章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地方志是传承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史志工作者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

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里我举几个

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英国有乔叟、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等大师。德国有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大师。美国有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师。我最近访问了印度，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四种本集，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泰戈尔更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

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

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

我们讲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现在，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

我讲过，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就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要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蠢事。既要保护古代建筑，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建筑，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方特色的民俗。

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

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2015年12月20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四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

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

方案。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六

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

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七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要抒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实

践，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

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
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
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
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屹立于世。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
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八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

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
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017年10月18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

“西域雄狮” ——张仪潮收复河西走廊始末

华丹 陈谦

按：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陇右道诸州，在河西地区推行部落制度。唐朝中后期，张仪潮领导河西人民起义，收复河西诸地，建立归义军政权，甘、凉十一州归唐。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位于甘肃西北部，祁连山以北，合黎山、龙首山以南，属于典型的“两山夹一涧”地形。由于地处黄河以西，因此被称为“河西走廊”。该走廊地域狭长，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最狭窄处仅数公里。境内大部分为山前倾斜平原。与周边的沙漠、戈壁不同，祁连山冰雪融水的灌溉，使该地区水肥草美，农牧业发达。在西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地区基本被游牧民族所控制，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牧场和前沿阵地。元狩三年（前120年）春，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出击河西地区，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河西之战。是役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浑邪王斩杀休屠王并率所辖四万余众归降西汉。为加强对河西走廊的管控，西汉设

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自此，河西走廊地区正式并入中国版图。

河西走廊的并入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略上，地处两山之间、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扼控从中原进入广袤的西域地区的咽喉，夺取河西走廊就意味着西汉从此正式打开通往西域的陆路。在地理位置上，河西走廊北部和南部是历来被游牧民族控制的蒙古高原及青海高原，这两个地区始终处于中原农耕文明和塞外游牧民族反复进退的拉锯战中。河西走廊的开通，中国的商队和使团得以拥有一条可靠的、安全的道路途径西域后向更远的西亚、欧洲地区前进；西方的商队和使团也得以途经小亚细亚、波斯、中亚、西域后，通过河西走廊到达中原地区。自此，一条绵延数千公里，延续2000多年，对后世人类东、西方文明产

生无法估量影响的文明之道——丝绸之路，拉开了人类文明交流史的新纪元。

河西走廊因其具有的重要战略价值，历史上中原政权都牢牢控制着这一咽喉重地。但是，到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唐王朝将西域、陇右、河西、朔方一带原本用来对抗外敌的边境驻军悉数调往内地平叛的时机，从唐至德元年至广德元年（756年—763年），先后攻占了青海大部分、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又继续向河西进攻。广德二年（764年）攻陷凉州，大历元年（766年）攻陷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攻陷瓜州。沙州军民在与内地隔绝无援的情况下，坚守孤城11年后同吐蕃谈判，以沙州军民“无徙他境”为条件，于贞元三年（787年）投降吐蕃，河西走廊全部为吐蕃占据。

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后，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极端残暴的统制。烧杀劫掠、苛捐杂税、繁重劳役，并将奴隶制推行到了河西地区，强迫汉人吐蕃化，平时不准汉族百姓穿汉服，只准每年春节穿唐衣拜祭祖先。汉人每逢此时来临，皆向东号哭，盼望唐朝收复。韦伦出使吐蕃归国时经过河西，一路见唐人“皆毛裘蓬首，窥覩墙隙，或捶胸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资治通鉴》卷226《考异》引《建中实录》）。白居易在《缚戎人》诗中写道：“……一落蕃中四十载，迁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朔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

垂”。而此时经过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已无力驱逐入侵者，收复河西。河西人民只得不断发起反抗吐蕃占领的起义，虽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但也遭到了血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改变河西走廊命运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就是被后世赞誉为“西域雄狮”的晚唐名将——张议潮。

贞元十五年（799年），张议潮出生于沙州。张氏世代为沙州豪门首富，但显赫的家族地位并没有为张氏家族带来平安。与后世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不同，吐蕃政权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为维护统治去联合、笼络当地汉族豪强大户，更没有打算让其参与政治。当地世家大族同样遭受吐蕃贵族的欺诈和蹂躏。张议潮自幼立志驱逐吐蕃，回归唐朝。以家产为军资，秘密招募、训练义军，同时不断收纳反抗吐蕃起义被镇压后的流亡者，蓄积力量，伺机而动。会昌二年（842年），吐蕃王朝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大规模内乱，曾经令唐朝和河西军民闻之色变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被杀。朗达玛无子，掌握实权的吐蕃大相企图立其三岁的侄子乞离胡为新赞普，扶植一个傀儡，遭到王室成员及其他贵族的激烈反对。各方互不妥协，最终导致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内战。期间，贵族尚恐热攻占都城逻些和大部分地区，自称宰相。在与其他贵族混战中，尚恐热劫掠河西地区州郡，大肆烧杀抢掠，激起了河西人民激烈反抗，也进一步加剧了吐蕃内乱，削弱了吐蕃实力。大中元年（847年）五月至大中二年

(848年)十二月间，唐朝政府击溃了尚恐热发动的几次大规模入侵，陆续收复原州、威州和扶州。吐蕃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张议潮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

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联合当地其他豪强，揭竿而起。面对数倍于己的吐蕃驻军，在沙洲居民的全力配合下，张议潮采取佯装败退，途中设伏截击的战术。战斗中，作为主帅的张议潮披挂盔甲，骑乘战马，挥舞大刀始终冲在最前线。在主帅无畏精神和对吐蕃残暴统治巨大愤恨的双重鼓舞下，义军将士无不奋勇争先，拼死杀敌。进攻的吐蕃军大败，被杀、擒数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残余者落荒而逃，沙州光复。张议潮趁胜进击，一举收复瓜州。随后，张议潮即派遣使节前往故国唐朝。大中四年(850年)，以敦煌高僧悟真为首的河西使团历尽磨难，冲破吐蕃重重阻隔，到达长安，向朝廷呈递张议潮回归唐朝的表章以及河西民众恳求故国出兵协助起义军的万民折。唐朝政府随即派遣军队进入河西地区，协助起义军。在派出使团的同时，张议潮以沙州为根据地，采取“且耕且战”的战略，一方面整训军队，扩充军队；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囤积粮草军需，义军迅速壮大，在陆续击退吐蕃对沙州的数次反扑后，张议潮开始对吐蕃全面反击。

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率义军对吐蕃在河西地区驻军发起大规模反攻。各地民众闻风纷纷起义，义军势如破竹，连克伊

州、西州、河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廓州、岷州九州，推翻了吐蕃在河西地区近百年的侵略统治。至此，大唐河西“甘、凉十一州”全部光复。

大中四年(850年)五月，河西起义捷报送到长安，唐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八月，以张议潮弟张议谭为首的29人河西使团到达长安，朝见大唐皇帝，呈递河西走廊地区沙州、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十一州地图、户籍和贡品。十一月，唐朝政府下令以河西义军为主，在沙州建立归义军，负责防守河西十一州。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成为整个河西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时唐朝政府已国力衰败，内忧外患，只能向河西地区提供极其有限的经济支持，而张议潮面对的则是一片残破的河山。吐蕃占领河西后，原封不动的将奴隶制搬到河西地区，致该地区本来十分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政治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吐蕃虽被驱逐，但河西地区的经济已经崩溃，军事形势也不容乐观，河西北方是另一个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回鹘。回鹘与唐朝的关系比较特殊。一方面，回鹘曾经直接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另一方面，回鹘又经常骚扰、掠夺唐朝北部边境，对河西走廊也一直虎视眈眈。此外，吐蕃统治期间河西地区迁入大量少数民族移民，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河西战略重镇凉州依然被吐蕃侵

占。面对严峻的形势，张议潮在河西地区大力实施改革。

首先是恢复政治制度和经济生产。张议潮以归义军强悍的武力震慑为后盾，在河西地区全面恢复了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完全按唐制恢复了河西地区的县等基层行政区划。在河西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地，彻底废除近乎半独立的部落制度。采取恩威并施的措施，奉行唐朝一贯的民族平等政策，大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的支持。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充分尊重和保护，甚至制定了极为严明的法规和军纪以约束军队和汉民众。对极端强硬的民族则严厉打击。在这些政策作用下，河西地区有重大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吐蕃首领尚延心、回鹘首领仆固俊等相继率众归降。张议潮奏请朝廷，任命尚延心、仆固俊为唐朝武将，并将其所属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兵士进行整编，组成骑兵军团，总人数接近7000人，成为河西归义军一支强大的精锐力量。同时，大力发展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从内地引进大量先进技术和文化类产品；兴修水利设施，开垦荒地；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在张议潮的治理下，河西地区在短短数年时间里，迅速恢复元气并且取得较大发展，经济、文化和军事势力都得到显著增强，敦煌成为西域名城。唐朝特使巡视河西后，在奏章中明确称“观河西之地，旧时胡风尽去，唐风大盛。人物风华，一同内地”。

随着经济的恢复，河西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归义军发展成为一支以汉族为主，包括多个其他民族士兵在内，以骑兵为主力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张议潮开始大规模对侵犯河西地区者用兵。大中十年（856年），大败受吐蕃指示袭击河西的吐谷浑。在肃清外围支脉后，张议潮集中兵力，于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亲自率领7000骑兵东征吐蕃在河西走廊最后的据点凉州。咸通二年（861年），归义军全歼近万名吐蕃守军，收复凉州。至此，吐蕃势力被彻底逐出河西走廊。咸通四年（863年），唐朝政府任命张议潮兼任凉州节度使，统辖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全部军、政、民事务。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率主力骑兵数万人继续西征吐蕃。归义军所向披靡，斩首吐蕃军万余人，陆续收复西域西州、北庭、轮台（今新疆高昌、吉木萨尔、轮台县），前锋深入西域。这是自安史之乱百年后，唐朝军队进入西域故地距离最远、战果最大的一次远征。十月，深入吐蕃纵深腹地的归义军在张议潮、仆固俊等指挥下，在廓州（今青海贵德）包围吐蕃大相尚恐热，吐蕃全线崩溃。张议潮麾下少数民族将领拓跋怀光率500精锐骑兵冲入廓州，在乱军中斩杀吐蕃主帅尚恐热；尚延心击溃吐蕃残军。曾经威震西域甚至一度攻占长安的吐蕃王朝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加之内部分裂以及西方大食的攻击，彻底衰败。至此，按史书记载，唐军“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

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沦陷近百年之久的陇右地区回归唐朝。

此后，张义潮坐镇河西，击败回鹘，在河西恢复了唐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河西再度开始繁荣。咸通八年（867年），已经69岁的张议潮亲到长安，“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为表彰张议潮的不朽功勋，唐朝政府晋封其为左神武统军，晋官司徒，南阳郡开国公。咸通十三年（872年），张议潮在长安病逝。朝廷追封张议潮为太子太保，以国公规格下葬。

张仪潮收复河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

要的意义，河西走廊恢复通畅，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河西人民热忱赞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后世评价张仪潮：“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犴，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猗猗，款少骏之馭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汉匈战争和河西四郡的建立

李清凌

按：丝绸之路的兴盛和衰败，与中原王朝的强盛繁荣密切相关。汉匈战争，中原王朝将河西走廊控制在汉王朝的版图中，并设置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设立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农业区，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原王朝的强盛，是“丝绸之路”开辟与畅通的前提和保证，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和河西四郡的建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匈奴进驻河西，阻断中西交通

人们一般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但事实上，早从先秦以来，中原地区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就已经存在，只因张骞出使西域是代表国家的行为，所以后人才以此作为“丝路”开通的时代。秦汉之际，中原战乱，秦朝迁徙戍边的人及各地移民纷纷离去，于是匈奴冒顿单于趁机起兵，东破东胡，西逐月氏，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北征丁零、坚昆等部，控制了自东北、蒙古高原到西部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其活动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罗布泊往东，经河西走廊直至秦长城陇西段地域，阻断了中原与西域之间联络的“汉道”，

西北包括甘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影响。

冒顿单于见汉朝初建，经济未振，人力财力俱困，便频繁地挥师南下，长驱直入，抵近关中。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兵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反击，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南），数日不得解围，后重贿匈奴阏氏（单于正妻）脱险。西汉最高统治者深感难用武力抵抗，采纳谋臣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汉朝将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并输送大量的絮、缯及米、酒等生活用品；又在边界设立民间贸易市场，帮助匈奴人解决生活亟须。直到惠、文、景、武帝初期，以及武帝以后的各代帝王，沿用这一方式来延缓匈奴的侵扰。但和亲、互市等并不能完全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闯入河南地

(今河套以南), 插帐久居, 俨然将侵扰汉朝的前沿当成了后方。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 匈奴单于带14万骑入掠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市东南), 杀北地都尉孙印, 虏民及畜产甚多。又进至彭阳县(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 烧毁秦始皇所建的回中宫(在今陕西凤翔县西), 巡逻兵深入至云阳县西的甘泉山(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距长安仅300里地。时汉文帝决定亲征匈奴, 群臣谏, 在皇太后的阻止下未成行。乃遣三将军驻陇西、北地、上郡, 发“车千乘, 骑卒十万”, 才驱逐匈奴。汉朝在防御之外, 寄予建立和约, 但匈奴单于并不按约办事, 此后侵汉更加频繁。

二、汉武帝击败匈奴的战争

民族政策是随着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而变化的。西汉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 到汉武帝时(前140—前87年), 社会生产力提高, 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政治、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统治阶级对匈奴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汉武帝制定了东连朝鲜, 断匈奴之左臂; 西连月氏, 断匈奴之右臂, 后集中优势兵力, 彻底击败匈奴的战略计划。为此, 派张骞出使西域, 联络大月氏等西域国家, 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出使的军事效果并不显著, 却开通了汉朝与西域联络的渠道。此后, 汉朝依靠自己的力量, 主动向匈奴出击。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到元狩四年(前129—前119年)的十年间, 汉、匈之间进行了十数次战争, 其中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

年)的河套之战, 元狩二年(前121年)的祁连山之战和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相继重创匈奴。

元朔二年(前127年), 匈奴扰边。汉武帝令卫青从西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渡过黄河, 进至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 斩断了停留在黄河以南匈奴与单于王庭的联系。随后顺河南下, 经北地郡直至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 完成了对黄河南匈奴的大包围。在这次军事行动中, 汉军斩首数千, 获牲畜百余万, 驱逐盘踞在河套以南的白羊王和楼烦王, 建立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 恢复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其后匈奴仍然连年侵入汉朝边郡, 烧杀抢掠。元朔五年(前124年)春, 汉武帝令卫青率三万骑出高阙, 卫尉苏建、左内史李沮、太仆公孙贺、代相李蔡等俱出朔方, 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轻敌饮醉, 汉兵夜至, 围右贤王。右贤王与爱妾及数百骑溃围北逃。汉军虏其十余个小王, 一万五千多人口, 上百万牲畜。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 汉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 一路获捷。当时, 汉军逾乌戾(今甘肃永登县的庄浪河), 讨速濮(匈奴须卜部, 在今甘肃永登县北至景泰县境), 涉狐奴(今甘肃武威市石羊河), 历五王国, 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 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有余里, 合短兵, 鏖战匈奴于皋兰(在今甘肃临夏县大夏河南, 一说在今兰州市)下, 杀折

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杀八千九百六十人，收休屠祭天金人。汉虽也在战争中损伤了十分之七，却终于战胜了匈奴，汉武帝在汉兵损失严重的情况下，“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誓灭匈奴的决心。同年夏天，霍去病等又出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市西北），远至祁连山，俘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员六十三人，相国、都尉及其所部二千五百人，斩首三万余级，致命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右部的接连失败，震动了匈奴单于，要以罪诛右部的浑邪王、休屠王。浑邪王乃与休屠王商量降汉。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将其众投降汉朝。汉武帝令霍去病率兵往迎，收降者四万人，号称十万。汉朝将这部分匈奴人分别安置到五原（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等边郡塞外，因俗而治。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役。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带五万骑，步兵及随军转输者数十万人西征匈奴。卫青军出塞千余里，斩首万余级，进至阏颜山赵信城（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霍去病轻减行装，跨越大漠，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以下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禅于姑衍（在狼居胥山西边）。俘获七万余人，摧毁了匈奴左贤王的主力。此役，汉军损伤重大，出塞时带去官、私马十四万匹，入塞时剩下不满三万匹，人员十减其七。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病逝，时不到30岁。汉武帝将其葬

到茂陵，起冢象祁连山。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使汉匈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汉朝占有了从朔方郡至张掖、酒泉间的大片土地，砍断了北匈与南羌的联系，扫清了中原通西域的障碍。

匈奴主力退入漠北以后，仍然南下扰边，侵犯酒泉、敦煌一带。天汉二年（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杀万余级，汉兵死者十之六七。征和三年（前90年）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汉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二万人出河西，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商丘成至浚稽山（即今蒙古南戈壁省北部阿尔泰山脉东南段），“与虏战，多斩首”。

汉昭帝始元七年（前80年），单于欲重新夺得酒泉、张掖之地，乃遣右贤王、犁汗王率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治所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屋兰（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东）、番和（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迎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此后一段时间，匈奴扰边渐少。

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遣御史大夫田广明等率兵20余万出击匈奴，获单于父行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骆驼七十余万。这年冬，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俘获不多，撤军路上，又逢大雪，百姓畜产冻死众多，还者不到十分之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

加上饥荒，“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属国瓦解。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再遭饥荒，西域城郭诸国乘机共击匈奴。汉宣帝元康至神爵年间（前65—前58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附汉，向汉求婚，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嫁单于。从此直到西汉末，汉匈之间基本保持了和平安定的民族关系。

三、河西纳入汉朝版图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破匈奴，浑邪王降汉以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汉朝政府乃先后在河西建立了四个郡，并从内地移民实边。

《汉书·西域传》记载：霍去病击破匈奴后，汉朝政府在河西实行新的管理，开始修筑令居（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以西的关隘亭障即长城，并最早在河西建立了酒泉郡，陆续迁徙内地民众实边，在此基础上，分设了武威、张掖、敦煌三郡，使汉朝政府在河西地区的管理和防卫机构列四郡、据两关（玉门关、阳关），初具规模。由此看来，河西四郡中酒泉郡建立最早。《汉书·武帝纪》的说法与此基本相同，《汉书·地理志》记河西四郡的开置时间是：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开。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

酒泉置。

事实上，河西四郡的建设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各郡的政治作用也经历了从纯军事向地方行政和军事双重功能的转变。在严酷的战争下，曾经长期占据河西的匈奴或死、或降、或逃，河西“遂空其地”以后，汉朝政府在令居以西开始修筑边塞亭障，解决河西最为紧迫的军事交通和防务问题，同时先设立一个或两个郡，管理河西的军事行政事务，待逐渐徙民充实之后，再增加建置，使河西形成“列四郡，据两关”的行政、军事管理格局，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河西建郡的政治起因，除了实行行政管理，北防匈奴，南御群羌外，还有一种说法或目标就是通西域。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经过张骞派出的副使联络，西域各国使臣陆续到汉，送来汉武帝特别喜爱的汗血马以后，汉乃“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将汉置酒泉郡的目的，直接说成是为了“通西北国”，即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

河西四郡的建立，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结构和管理体制。河西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置四郡后，汉朝大量地从内地向河西移民，又派大量军队前来戍边。据载张掖、酒泉建郡以后，汉朝在包括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在内的区域内，共安置了“六十万人戍田之”。戍，是防守；田，是屯田。汉武帝又使李陵“将丹阳楚人五千人”为教官，“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训练军队，防御匈奴等，对于维护河西的开发和中西交通的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

汉朝对河西军民实行的郡县制和边耕边守的屯戍制管理，无疑比匈奴驻牧时代进步。河西汉族兵民人口的增加，不仅使这里的居民由少数民族为主转变成了以汉族为主，而且经济形式也由以牧为主转变成为以农为主、农牧兼营的形式。少数民族继续利用这里“水草宜畜牧”的自然资源发展畜牧业，“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屯田和民营农业开发，适逢“风雨时节”，因而粮食产量大增，“谷余常贱”。社会风气也有改善，“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

上下通焉，吏民相亲……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郡守治理，关注军事防备，又通过乡饮酒礼等形式，加强了官民联系。社会上盗贼减少，和睦气氛增加，风俗好于内地州郡。这无论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边防建设，或是开拓经营西域，都是极好的物质基础和基础建设。

（原载《甘肃日报》2019年9月18日第12版。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华亭县志》出版发行

2019年10月15日，《华亭县志（1988—2009）》举行首发仪式。全志共33编121章420节，111.1万字，收录图片350多幅。该志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1988年至2009年间，华亭县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突出改革开放，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华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郭维福供稿）

《诗经·大雅·绵》“虞”“芮”地望考辨

郝 玥 张绍冬

内容摘要：关于《诗经·大雅·绵》中“虞”“芮”二国之地望，旧说在今山西南部。今人已力证其非，并指二国之地望应在陕西陇县。结合诗歌所涉历史、传说、地理背景、军事形势等因素综合考察，“虞”“芮”二国当在今甘肃省华亭县境内。

关键词：诗经 虞芮 地望

《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中，“虞”“芮”二国之地望，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皆在山西境内，虞国在平陆，芮国在芮城。这种说法流传最广。平陆县至今还遗存有二君祠以纪念虞芮争讼让田之事，为当地政府重点保护文物。另一种说法认为，芮国在“同之冯翊”，即今陕西大荔、朝邑县一带。今人齐思和、刘毓庆已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证上述二说之误，并提出“陕西陇县”说，令人耳目一新。但笔者在考察有关地理文献后发现，“陕西陇县”说也是值得商榷的。“虞”“芮”二国应当在今甘肃省华亭县境内。

一、“平陆—芮城”“冯翊”说辨

考定“虞”“芮”二国地望，需对有关二国地理考证之旧说做一简单回顾。

1. “平陆—芮城”说

“平陆—芮城”说，源自唐·李泰《括地志》：

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元注《水经》云：軫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

间原在河北县西六十五里。

故芮城，在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也。晋《太康地记》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1]。

李泰以“间原”为《诗》“虞芮质厥成”中争讼之地。贺次君《括地志辑校》谓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文“虞山之上”下有“古虞国也”四字，无郦元注《水经》文。这大概是过去关于“虞”“芮”地望最流行的说法，然而考之相关史料和今人观点，在“争讼”的前提下，此说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作为确定“虞芮”地望的证据不充分。

《毛传》和《史记》均明确“虞、芮争讼让田”是文王时事。

《毛传》：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餘国^[2]。

《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3]。

《括地志》之故虞城，即班固《汉书·地理志》之吴城：

河东郡：大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4]。

然而班固并未提到吴城就是“争讼”时之虞国。《括地志》虽提及“故虞城”及“间原”，但只有《史记正义》所引之“古虞国”、《毛传》所载之“争讼”意指“故虞城”就是“争讼”之虞国。因此，李泰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此“虞芮”就是文王时之“虞芮”。齐思和认为此“故虞城”为“春秋

之虞，非周初之虞”。本文认同这一观点。

其二，与“争讼”之事理亦难相符。

齐思和《西周地理考》“平陆距岐山，远在数百里之外，是时周室初兴，崇、墉未服，声威所及，恐不能若是之远。”^[5]

刘毓庆《诗经图注》“若虞、芮在山西南部，则去文王所在之岐周约五百里之遥，中隔黄河、洛水、泾水，二国之人何故跋山涉水行如此之远找文王断案？”^[6]

因此，“平陆一芮城”说显然是有疑问的。

2. “冯翊”说

明确记载“芮”在冯翊者，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

左冯翊：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芮乡，故芮国^[7]。

但是这个“芮国”是不是争讼时的芮国也是有疑问的。首先，班固并未说明此芮国就是虞芮争讼时之芮。其次，从地理的角度看也有问题。刘毓庆认为：“若芮国在陕西大荔，则虞、芮中隔黄河，又岂能有争田冲突？”今按：“冯翊”之说，张守节《史记正义》已辩明其非，宋以后即鲜有从者，兹不详述。

二、“陇县”说辨

《括地志》以平陆之虞为古虞国，后世《诗》家不加详辨，讹误流传了千余年。今人齐思和、刘毓庆力辩诸说之误，均以为“虞”“芮”当在今陕西陇县境内。齐思和认为：“余考古虞本在今陇县境，汉之汧县也”“《地理志》‘芮水出西北，东流泾。’是

虞、芮同在陇县，地相毗连。地在岐山西北，古之虞、芮，当即在是”。刘毓庆认为：“窃疑虞、芮古地当在陕西陇县的吴山、芮水一带。《汉书·地理志·右扶风》记汧县有吴山。吴、虞古音相通。《诗经·丝衣》‘不吴不敖’，《史记·孝武本纪》引作‘不虞不敖’。周掌山泽之官，《周礼》称‘虞’，金文则作‘吴’。《汉志》的‘吴山’，《周语》正作‘虞山’。吴山今名陇山，在今陕西陇县与千阳县境内。《周礼·夏官·职方氏》言：‘雍州其川泾芮。’《地理志》说：‘芮水出汧县西北’，其发源也在陇县。虞、芮二国当因虞山、芮水而得名。二国连壤，且与岐周为邻，文王质其成，于理为顺。”^[8]

“陇县”说显然比过去的说法更加令人信服。笔者按照齐思和、刘毓庆的思路试图考证“虞”“芮”二国的位置，但查阅方志文献时却发现，“陇县”说似乎也站不住脚。

1. “虞”“芮”地望考

先来看芮水。按《地理志》所言，是出自“汧县西北”，实际上此水不是芮水，而是汧水。清顺治间，甘肃崇信县知县武全文有《汧源辨》一文云：“今考陇州诸水，皆由汧入渭，不与泾通，此不待辨而知其与汧无涉也。”^[9]这也就是说，陇州境内，并没有一条叫汧水的河流。真正的汧水，应当在今甘肃境内，源出华亭县西南之陇山。

清·乾隆甘肃省《泾州志·山川》：

汧水在西南，自崇信界来，发源华亭县湫头山之朝那湫，东至泾宫山下，与泾合流

入渭^[10]。

民国甘肃《华亭县志》：

华亭之水，统名汧水，发源地皆在小陇山^[9]。

明·王宁《穷汧记》：

汧在华亭城东三里，乃两水合流，而其北源西出小陇山之马峡，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陇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环朝那山前，盖山有古朝那王庙，其西北有湫，东去县东三里而别称为雨山。南源环王母山，山巅有古王母宫，东去四里，别称为仪山，俗呼为回头山。仪州实以是名也。仪、雨两山南北对峙，豁开如门，故两水合而东流，名之曰汧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专名为汧也^[9]。

再来看虞山，《汧源辨》：

吴山即陇山，华亭与陇州山连壤，接界内诸山皆属陇，又曰小陇山。

清·乾隆陕西省《陇州续志·方輿·山川》“吴岳”条：

州南七十里。《禹贡》“导岍及岐”，孔《疏》云：“吴岳在扶风汧县西，古文以为岍山。”《汉书·郡国志》“汧县有吴岳山，别名吴山。”《水经注》“汧水发南山西侧，俗以此为吴山。三峰霞举，叠秀云天，崩峦倾反，山顶相捍，望之常有落势。《国语》所谓虞者也”……窃谓吴山，《汉志》虽云在县西，而冈峦绵亘，延及其南，与岳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岳山，俗又谓之吴山，或又合称吴岳，而岍山之名遂隐。其实此二山者，《周礼》总谓之岳山，《禹贡》总谓之

岍山，当以《汉志》为正。今考吴山，西连关、陇、岍、慈诸山，则《禹贡》所云“导岍”，自应指目大概。

吴山实为西北诸山之纲纪，众水之统宗，宜乎巋崔岍崒，与太华相伯仲，而膺西岳之显号。飡历代之明禋，为秦中巨镇也夫^[11]。

《读史方輿纪要·凤翔府·陇州》“陇山”条：

小陇山在州西八十里。一名关山，以近陇关而名也。山长八十里，路通临巩，为秦、凤要害。其顶，即分水岭。

“岳山”条：其实吴山在州西，而岳山在州南也^[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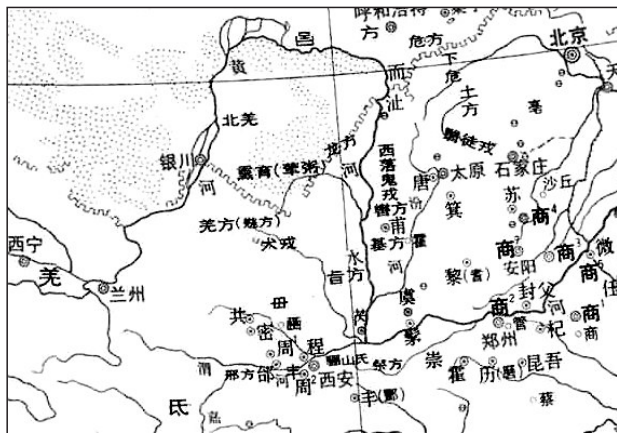
综上，华亭县境内诸山，皆属吴山。因此，“虞”“芮”得名之吴山、汭水，均应在今甘肃华亭县境内，而新修《华亭县志》，亦指明华亭为古芮国所在地。

2. 从“虞芮质厥成”看“虞”“芮”地望

《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句，理解其含义之关键在“质”字，《说文》作“以物相赘”。又有盟约之义，《左传·哀公二十年》“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今按：“质”字，当依《广雅》解作“定”。《史记·周本纪》载文王“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需要注意的是，此“受命”是受商王朝之任命得以专征伐，不是后来宣传的受天命作周之年。《竹书纪年·纣王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沈约

注：“文王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13]宋·王十朋《梅溪前集·武王论》“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还，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使得专征伐。自是而后，文王始居方伯连师之职，五侯九伯得以征之，于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专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则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专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14]

受命于商，是说此时周虽有翦商之志，但实力尚不足以与商抗衡，仍需韬光养晦，故不敢宣称受天之命。但是，这对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战略形势自此以后发生重大变化，周开始征伐诸侯直至灭商。受命于商，不是受天命作周，则“虞芮质厥成”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王平二国争讼。《周本纪》记载文王“受命”之年“质虞芮”后的事件，次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四年败耆国，五年伐邶，六年伐崇作丰，均与“受命”征伐有关。从逻辑上讲，“质虞芮”也应与之有关。我们可以从商周之际的形势来理解这一事件。



商周时期地图

如上图,“虞”“芮”二国的位置,大致在密西北、犬戎西南一带,与犬戎、密等国均在周方国西北。《周本纪》记载的征伐顺序,是先犬戎而后密。从“争讼让田”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虞、芮二国有可能在文王受命于商之年臣服于周,或与周缔结盟约,从而确立和睦的关系。然后,向北征伐犬戎。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质虞芮”,既可钳制密,又为讨伐犬戎作准备。与“虞”“芮”二国交好,对于周方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以之为根据地,讨伐犬戎、密须之后,周之西北局势稳定,免除了后顾之忧,文王才可以专心东进,实现翦商之志。

旧说以为虞芮在山西者,主要是从赞美文王德化的角度解《诗》,忽视了对于历史事件、地理背景等客观因素的考虑,因而结论往往失之牵合。“陇县”说之误,则是没有考虑到商周之际的战略形势。因此,笔者认为,“虞”“芮”二国地望,皆应当在今甘肃华亭县境内。

参考文献:

[1]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

[2]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4] (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5] 齐思和著,《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刘毓庆著,《诗经图注(雅颂)》,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 (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8] 刘毓庆著,《诗经图注(雅颂)》,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 (民国)郑震谷等修,幸邦隆总纂,《华亭县志》,民国22年石印,1976年。

[10] (清)张廷福纂修,《泾州志》,乾隆十八年抄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0年。

[11] (清)吴炳纂辑,《陇州续志》,乾隆三十一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12]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

[13] (梁)沈约注,《竹书纪年》,文渊阁《四库》本(第0303册),P0021b。

[14] (宋)王十朋,《梅溪前集》,文渊阁《四库》本(第1151册)。

(本文转自《史志学刊》2019年第4期。
作者单位:郝玥,山西财经大学;张绍冬,太原市通达运输代理总公司)

定西乌龙关考证

张文彩

按：乌龙关在志书中多有记载，宋置，本文从乌龙关的名称由来、地理位置等，对乌龙关进行考证，认为乌龙关址为定西市安定区东西河之间南接陇西，即内官营镇东南二十里的乌龙、清溪川南端的汪家嘴。

一、乌龙名称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嘉孚撰《安定县新志·卷山川》记载：“乌龙川在甸子川东昔有乌龙见于此。”^[1]清顾炎武撰《肇域志·陕西平凉府巩昌府》记载：“永乐间，龙马出焉。”^[2]

清康熙年间（1661-1722年），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558卷巩昌府部第105册》记载：“甸子川，在县西北六十里，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通渠流水，物产最盛。内有乌龙川。”^[3]清高锡爵修、郭巍纂《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2·康熙巩昌府志卷五九》记载：“安定县甸子川在西北六十里有内官营，商货四集，盖门达之处也。”^[4]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张尔介、曹晟等纂修《甘肃省安定县志（全）卷之一地里》记载：“甸子川，西四十

里，西河发源，物产盛于他里，贸易业集。明肃府置内官营于此，设有百总今裁。”又载：“乌龙川在甸子川之东相传有乌龙曾见于此。”^[5]清初北峦山人《定山野志》记载：“甸子川，县西四十里，西河甘（甜）水之源出此。明朝建文帝时朱元璋第十四子肃王朱模将藩府由甘州（张掖）迁至兰州后，私建营，置内官，隶十三户，于兹为牧马地。”又载：“乌龙川县西三十五里相传乌龙曾见于此通陇西渭源。”^[6]薛仰敬^[7]《陇右名物大观·古今地名篇》记载：“乌龙川。在内官营东南20里，宋置乌龙关于此，为陇西、渭源去兰州的关隘。这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先后数次发现宋代砖室墓。乌龙川宋元之际土广人稀，一川有高二三米的黑酸刺灌木林，在弯曲的干河两岸如黑色之龙丛茂生长，故名。据当地八十多岁老人回忆，民国初年川里还有胳膊粗的黑酸刺砍来

当椽子盖房子。”《定西地区志》记载：“内官营镇原名甸子川，明建文帝（1399-1402年）肃王朱模自甘州移府兰州，置内官营于甸子川。内官营佛沟亘有古城川，据传为自唐宋以来的西市古城地，宋设乌龙关。明有甸子川递运所。自古是水草丰满、适宜放牧的丰腴草甸川原。”^[8]

甸子川即今天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的旧称，唐宋时称西市、西市城，在今内官营镇贡马营之古城川，北依佛沟门，东临暖泉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出兰州，西、西南、南分别接通临洮、渭源、陇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地阔平坦、水草肥美，是古渭州牧马贩马之地。

乌龙川在内官营东。现山沟莽塬上依旧自然生长着一种黑色酸枣刺树，外形小，枝干有刺且坚韧，颜色深黑，其果似沙棘，耐寒耐旱、性喜阴湿、成团成簇。从远处看，蜿蜒升腾、神不见尾，像乌色的游龙。以此作为乌龙地名由来的说法，笔者认为更有道理。笔者曾走访内官营的一位金家老人，言刚来的时候山畔河渠到处都是黑酸枣刺树，本来是一种灌木，但长得时间长了，在无人破坏的情况下，成长为乔木，不仅可以当椽子用，有些还能当檩子用。

另有一种植物袍木芽，别称乌龙头，又叫木（穆）龙头，在内官乌龙一带也有生长，以此作为乌龙地名的称呼，亦不无道理。

二、乌龙关设置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载：“乌龙

关，北宋置，在今甘肃定西县南东西两河间，南接陇西县。”《方輿纪要》卷59安定县：“乌龙关‘今亦曰乌龙厄’。”^[9]

清顾炎武撰《肇域志·陕西·平凉府·巩昌府》记载：“甸子川。在城西六十里。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通渠流水，物产最胜。肃府置内官营于此地，内有乌龙（注：川本同，滹本龙下有城字。大明一统名胜志卷九作‘内有乌龙关故址’。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六三同，疑此龙下脱城或故址），商贾四达，俗号‘马头’。东河，在城东三十步，环流域之东北，其味苦。发源于百里之麻子川，又名苦水河。西河，在城西一百步。环流域西北，其味甘。发源于百里之甸子川，又名甜水河。凡西之溪流皆属焉。至北城角折而东，与东河会。北流二百里至靖虏入黄河。盖邑中诸水之纲纪也。”^[10]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558卷巩昌府部第105册》记载：“甸子川，在县西北六十里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通渠流水物产最盛内有乌龙川。东河水，在县南四十里发源于麻子川其味苦又名苦水。西河水，在县西二十里发源于甸子川其味甘又名甜水。锦鸡原，在县西十里。”又载：“内官营，在城西六十里，甸子川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通渠流水、物产最胜。明肃王置内官营于此，内有乌龙关故址。”^[11]

清宣统升允等修《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之九·輿地志·关梁·巩昌府·陇西县安定县》记载：“甸子川在县西四十里有递运所。

乌龙关，在县南东西两河间，亦宋置，南接陇西县。今亦曰乌龙隘，旧志又有大西口双峪口等隘。内官营在县西南四十里明肃藩屯军处一望无垠越西南之三十里胡麻岭万山重叠毗连渭狄。”^[12]

清朝甘肃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容等监修《甘肃通志·卷五山川》^[13]记载：“东河，在县东源出麻子川北流绕城东北合西河入防宁县界。西河，在县西源出甸子川东北流绕城西又东会于东河东河味苦西河味甘甸子川在县西四十里土物阜盛商贾丛集明肃府置内官营于此。”《甘肃通志·卷十关梁一》记载：“巩昌府，陇西县，锦布隘，在县北六十里，其地有锦布峪因名。有锦布镇递运所，又境内有沙湾口、截道、深安、乌龙等隘，皆在县北。安定县乌龙关，在县南东西两河间，亦宋置，南接陇西县。今亦曰乌龙隘。又有晴岚峪口、大西口、双峪口、峡口四隘。”

甘肃日报记者王文元在《定西乌龙关，一座宋代古城的生态记忆，你都知道吗？》中写到：“关于乌龙关的具体位置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乌龙关就在内官营内，可以说关营一体。另一种说法是乌龙关在内官营东南20里的乌龙川内。乌龙关始建于宋代，这里是控制陇西、渭源去兰州、河西的关隘。后来，人们数次在这里发现了宋代砖室墓。可见，乌龙关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关隘。”^[14]

以上史料，证明乌龙关建置存在无疑，设置于北宋，其位置在定西市安定区东河、

西河之间，向南接陇西的地方，即内官营镇东南二十里的乌龙、清溪川南端的汪家嘴。东河即发源于麻子川向北流，与发源于胡麻岭经甸子川的西河在定西城北交汇。乌龙称为码头，必然是交通便利的商业之地，且汪家嘴东北西三面，均为开阔川原。此处置关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历史文化的根源，东临堡子坪遗址，南枕堡子坪梁，西靠清溪河，地下水源甘甜丰沛。其次，是堡子梁的最高峰，站立高出，甸子川、得罗川（西寨川）、乌龙川都尽收眼底。再次，是豁岷，这里向东至定西古城，向南连接通西古城，通过堡子梁沿山路可以直达陇西、渭源，西连内官营镇及贡马营古城（佛沟门古城），西南与临洮接壤，北通定西县城，四通八达，是设置险要关城的理想之所。

三、定西城的建立

安史之乱后，为加强京畿地区的巩固，松懈了边疆的防御，陇右大部及西域等地被吐蕃、羌族占据。吐蕃族守将禹藏花麻（《续资治通鉴长编》称禹勒藏哈木）驻守这一地域。郭汉儒编撰民国稿本《重修定西县志校注·卷七》记载：“麻家庙，在东坡上。谚云：先有麻家庙后有定西州。其旧可知，今废。（校注）麻家庙：传说为北宋时西夏驸马禹藏花麻所建，故名麻家庙。”^[15]

民国著名史家戴锡章撰《西夏纪·卷十三》记载：“宋治平三年（辽咸雍二年，是岁契丹改国号辽）西夏称拱化四年（1066年）春二月，升西市城为保泰军，以附马禹

藏花麻守之。西市距古渭寨仅百二十里，谅祚建造行衙，置仓积谷，移保泰军治于此，命花麻为统军，守其地。《西夏书事》^[16]《西夏纪·卷二十八》^[17]记载：“1063年，秦州钤（qian）辖向宝攻掠之，吐蕃首领禹藏花麻力不支，遂以西市及兰州一带土地举籍来献。谅祚大喜，遣兵戍之，而以宗女妻之，封駙马。”清人吴广成编修《西夏书事》^[18]记载：“熙宁八年（1075）冬十月，花麻尝疑边境有谋，遣酋长撒蝉等十四人入塞卖马，觐（chān）之，为德顺寨所获。知渭州蔡延庆曰：‘彼疑，故来觐；若执之，是成其疑也。估偿马直遣还。花麻心德之。’王韶城武胜，常恐夏兵来争，军中一日数惊。花麻密以蕃字文报无他，韶因遗以金帛，使伺国中动静。”元丰四年（1081），花麻听说梁氏囚禁了夏主秉常，乘国内大乱之际，花麻悄悄送信给熙州，请求讨伐梁氏。近代陇上知名学者慕寿祺编撰《甘青宁史略》^[19]记载：“且预约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五路西征只有宦官李宪一路成绩显著，《宋史·苗授传》记载：“元丰西讨，授出古渭取定西，荡禹臧花麻诸族，降户五万。城兰州，遇贼数万于女遮谷，登山逆战，败退伏垒中，半夜遁去。”（这里说定西不准确，尚未赐名。）南宋历史学家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20]记载：“其西使城赐名定西城。”贾文毓、李引主编《中国地名辞源》记载：“‘定西’取‘安定西边’之意”^[21]。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记载：“城

一，元丰四年置。定西，军北一百二十里。”^[22]（军即通远军，熙宁五年（1072年）以古渭寨置。）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定西县，宋定西城。金置定西县。升为州。故城在今甘肃定西县南二十七里。元初徙州于安西县。即今定西县治。后改安定州。明降为安定县。民国改为定西县。属甘肃兰山道。”^[23]《甘肃通志·卷二十二古迹》记载：“定西故城，在县南。元丰四年置定西城，在通远军北一百二十里，五年改定西城为定远军，七年夏人围定西城，熙河将秦贵拒却之。元徙州治安西县，此城遂废。”又载：“安西古城，在县北三十里，宋志旧名汝遮堡，绍圣三年（1096）经略章楙进筑，金初置安西县，元至元三年并入定西州。”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载：“禹藏族首领还有……其族帐在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县南27里）至打啰川城（打拉池）等地。”^[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六》载：“兰州西使城川原地极肥美，兼据边面，须多选募强壮，以备戍守西。”

元丰五年（1082年）李宪认为汝遮川西接定西城，北通胜如堡，东北扼石峡贼马来路。建言以定西城为通远军，以汝遮堡为定西城。宋王称撰《东都事略·西夏一·卷一百二十八·附录六》^[25]载：“乃筑汝遮堡展定西城以卫兰州。”定西城移至汝遮堡显然是为了保卫兰州，同时南拓展，即今定西城址，东西河环绕相汇关川之上，亦是定西八景之一双河冲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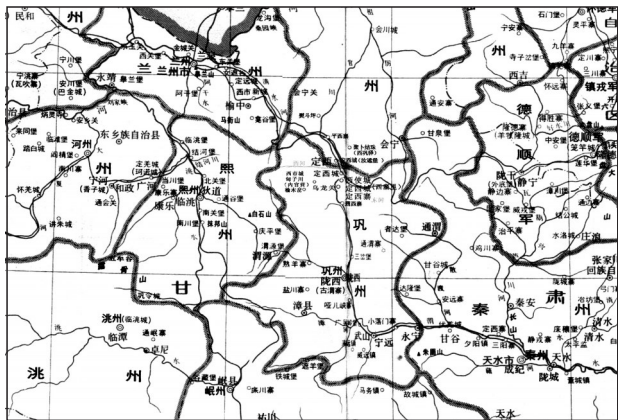
定西城的出现为乌龙关的修筑提供了依据,一方面向北可加强对兰州的巩固,另一方面向南加强对通远军的保护。故在定西城、西市城和通远军之间置关是必然的。

《甘肃通史·宋夏金卷》“河东、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都是北宋和西夏经常作战的地区。沿边各路州、军都统辖着许多的堡、寨、关、城,它们均为该地的防御重心。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游师兄请求自兰州李诺平东抵通远、定西、通渭之间,建汝遮、纳迷、接珠三寨及置护耕七堡,亦称‘以固藩篱’。显然寨堡有保障边境的职能,而西夏犯边,攻击目标常为堡寨。秦凤、泾原、环庆所辖的陇山东西是北宋防御西夏的前沿阵地,而这一地区边防线漫长曲折,又无山海峻深之险,只能靠在众多的控扼要冲之地构筑城关堡寨。北宋160多年的历史中,在西北沿边一带构筑了近五百个城关堡寨(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城关堡寨的兴建修筑,皆因边关战乱频仍,为了巩固收复的土地,或根据特殊形

势的需要,往往在川原河边或依山傍势之处建立堡寨关隘,这在只有战马、刀枪的冷兵器时代,确实能起到迟滞、阻挡、防护的作用。所以,宋时的这些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相互之间的一种依赖或负担,是历史的真实呈现。

四、结语

探究历史上定西曾设置过的乌龙关,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也是为研究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治通鉴·卷216》记载:“阆阆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从唐代宗宝应(762年)至金巩昌府便宜总帅汪世显降元(1235年),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西北大部都处在唐宋的边缘地带。因民族冲突不断,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和社会生产力,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直到明清乃至近代晚期,民族冲突一直是困扰河陇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并非天设地造,而是唐中期以后,在民族矛盾和冲突影响下逐渐形成并越拉越大的。



宋代定西及周边的城关堡寨(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参考文献:

- [1] (明)张嘉孚撰,《安定县新志·卷山川》,第6页。
- [2] (清)顾炎武撰,《肇域志·陕西平凉府巩昌府》,2004年4月第1版,第1492页。
- [3]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558卷巩昌府部第105册),中华书局,第47页。

[4]《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558卷巩昌府部第105册),中华书局,第11页。

[5](清)张尔介曹晟等纂修,《甘肃省安定县志(全)卷之一地里》钞本,第3-4页。

[6](清)北峦山人,《定山野志》钞本,山川野志,第18-19页。

[7]薛仰敬,《陇右名物大观 古今地名篇》《养静文集》。

[8]《定西地区志》2013年版,第229页。

[9]《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63页。

[10]《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55页。

[11]《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第558卷巩昌府部第105册),中华书局,第11页。

[12]《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之九),第312--313页。

[13]《甘肃通志》(卷五山川、卷十关梁一),第15页、37页。

[14]王文元,《兰州晨报》,2012年3月16日。

[15]郭汉儒编撰,《重修定西县志校注》,第66-68页。

[16](民国)戴锡章撰,《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第302页。

[17](民国)戴锡章撰,《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

[18](清)吴广成编修,《西夏书事》。

[19]慕寿祺编撰,《甘宁青史略》。

[20](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21]贾文毓,李引主编,《中国地名辞源》,华夏出版社,第79页。

[22](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第139页。

[2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及各埠商务印刷馆,第452页。

[24]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第124页。

[25](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齐鲁书社。

[26]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宋夏金卷》,第149-150页。

(作者单位:定西市安定区中华路中学)

山丹马场的历史沿革

车安宁

按：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抵达张掖市山丹县，前往山丹培黎学校和山丹马场考察调研，了解山丹培黎学校职业教育培训和祁连山生态环境修复保护等情况。

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城南50多公里外的祁连山冷龙岭北麓，有一片水草丰美，一望无际的山地草原，即古老的大马营草原（滩），这里地势扩展，气候适宜，水草丰茂，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场所。历史上著名的山丹军马场就在此地。古时的军马场几乎没有边界，东至永昌高古城堡，西至民乐永固堡，南屏祁连，北望张掖，处在祁连、焉支两山之间。如今的山丹马场依然地势开阔，跨于甘青两省，毗邻三市（州）六县，总面积329.54万亩。其中，草原184.98万亩，耕地40.3万亩，林地80万亩，其他面积24.26万亩，海拔依山势逐渐升高，在2420至4933米之间。属大陆性气候类型，有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润四个气候区。

山丹马场历史悠久，蜚声中外。据《山丹县志》记载，山丹古城在焉支山谷地近钟山寺处，“以晓日出映，丹碧相间如‘删’

字，又名删丹山，而县以此得名”。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已开始牧马，为月氏部族游牧地，后月氏败于匈奴，被迫西迁，匈奴浑邪王占据此地。从其“大马营”地名即可推测，这里曾是骑兵部队驻扎地。由于匈奴人屡屡东犯，威逼长安，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西征匈奴，扩大汉朝疆域，占领焉支山，匈奴人败退西迁并留下了千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此后，西汉在河西走廊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经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设马苑寺负责马政，在四郡分设牧师苑，即牧马场。河西四郡有牧师苑66处，战马30余万匹，其中以大马营草原为最，成为西汉最大的皇家牧师苑。自此，山丹马场开启了它的辉煌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战马是重要的、不

可或缺的战争工具，其数量和质量不仅直接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因此，历代政权都十分重视马业的发展，正常情况下，都会按时拨付充足的银两，也会选择精干的官吏担任各级马政官员。朝代更替，山丹马场几度盛衰，虽六畜兼营，但其养马主业经久未变，始终作为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和供给基地。早期，马场以当地蒙古马为基础，又不断引进各种西域良马，杂交培育出的山丹马因体形匀称，雄健膘悍，能耐粗饲，适应性好，速度快，持久力强而驰名天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山丹马场也有不同数量的马匹供民用役使，这也许是当年最早的“军转民”的作法。

北魏，祁连山一带大片草原被皇家划为官牧地，牧马上百万匹。拓跋宏年间，达到鼎盛，山丹马场牧马10万匹。

隋朝，隋炀帝巡视张掖，御驾焉支山大马营草滩，诏令在此设牧监，牧养官马，以备军需。

唐朝，国力强盛，尚马之风盛行，朝廷将俘获的2000匹突厥马和3000匹隋朝马交大马营草滩繁殖培育。太仆张景顺主持马政期间，河西一带有军马70万匹，杜甫作《天育骠骑歌》曰“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

历唐至宋，开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大马营草滩成为重要的良马收养地。至西夏，马场一度废弃。

元朝，设立专责马政的机构尚牧监，统管各地马场，山丹马场再度复置。

明朝，朱元璋派兵收复河西走廊，置大马营草滩为官办牧场，并以大马营为中心，在草滩边沿掘沟数百里，与民分界，大马营牧场场界首次划定。据史料，彼时有草场1337万亩，骏马4万余匹。

清朝，沿袭旧制，大马营草滩被列为中央直属马场。嘉庆六年（1801年），养马1.8万匹；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马约2万匹；清末政治衰败，时局动荡，马匹下降



至几百匹。

民国8年（1919年），马场划归陆军部军牧司管辖。此后，战乱频繁，军阀割据，军马场地处偏远地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偌大马场曾一度沦为地方军阀的私人牧场。民国29年（1940年），因抗战需要，马场又收归国民政府管辖经营，称为大马营军牧场。民国32年（1943年），任命场长宋涛，授少将军衔。民国35年（1946年），更名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山丹军牧场”，有马上万匹。

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奉中央军委电令：“要完整无缺地把玉门油矿和大马营军马场接收下来。”一野第二兵团即派得力人员接管军马场。时驻守军马场的仍有国民党军官81人、士兵524人，军马近万匹，于9月21日宣布起义投诚。山丹马场纳入人民解放军后勤基地，次年更名为“西北军区后勤军牧部山丹军牧场”。此后多年，山丹马场一直归属军队管理，为正师级建制，下辖7个分场及众多专业分队。

1952年，依据当地群众意见，西北军政委员会报经政务院批准，从山丹军马场界内划出150万亩草场，归周边群众放牧。1954年8月，遵照中央军委决定，全体干部、战士就地集体转业，马场实现军内企业化管理。1957年3月，总后勤部把山丹军马场交由农垦部管理，更名为“国营山丹牧场”。

山丹马场是我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军马繁育基地，也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

粮油肉生产基地。20世纪70年代，实现部队运动装备骡马化时，山丹军马场为全军提供了约三分之二的军马，其养殖规模可见一斑。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随着骑兵兵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改革开放的深化，2001年9月，山丹马场整体移交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管理；2013年7月，作为二级企业由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直接管理，现为张掖市规模最大的中央驻地方企业，也是国家第一批认可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1997年始，马场与多家高等院校及研究单位合作，以山丹马做母本，引进良种阿拉伯马、英纯血马、顿河马、奥尔洛夫马等，进行杂交改良，培育出新的阿丹、顿丹、英丹、奥丹等杂交马种，并于2012年通过汗血马冷冻精液培育出汗丹马。

大马营草原在历史上不仅为我国历代良马的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如今的山丹马场已经由单纯养马转向多种经营。马场的1000多匹马，三分之一用于旅游，夏季举行骑马旅游、野营、赛马或马术表演等，供游客游览自然风景名胜。其余用于提取血清，制药或制化妆品。山丹马场也是我国重要的塞上影视胜地，先后有《牧马人》《蒙根花》《文成公主》《王昭君》《和平年代》《红色康拜因》等30多部影视片在此拍摄。

（作者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仇池”地名读音辨正

魏泽民

内容摘要：地名是一种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甘肃陇南西和县的仇池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名词，“仇池”读音却一直叫法不一，本文从历史、人文、当地习惯对“仇池”读音进行辨析。

关键词：仇池 读音 辨正

一、仇池

仇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词，在汉魏晋时期，指的就是西汉水流域氐人居住的中心地带。仇池名称的由来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所指范围也随着氐人势力的变化而变化，但总体上还是在现今的陇南天水一带，也即现在文史专家所谓的“汉（水）——渭（水）文化圈”。

仇池山是文人名士向往之地。杜甫在《送韦十六出任同谷防御判官》等诗中多次提到仇池，如“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藏书闻禹贡，读记忆仇池”等，特别是在其《秦州杂诗》之十四中写道：“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表达了归隐仇池的心愿。北宋文坛领袖苏轼对仇池情有独钟，憧憬之

至，“一点空明是何处，老夫真欲住仇池”（《双石》），渴望“他年弭节过仇池”（《见和仇池》）。苏轼还将仇池与传说中的三仙岛之一的瀛洲相媲美，甚至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说“我念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壶中九华诗》）。苏轼对仇池情有独钟，就连做梦都想到仇池一游，到仇池卜居，远离官场，过几天宁静闲适的田园生活。苏轼晚年将自己的随笔式小品文集命名为《仇池笔记》，并写了《仇池论》。

仇池山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南境的大桥乡，地理位置在东经105°20′与北纬33°45′之间，海拔1791米，相对高度793米，山顶面积约15平方公里，有上码头、下码头和庵房里等几个自然村，山形呈舟船之状，四周丹岩石壁险要无比，历史上是兵

家必争之地。山上曾多次安营扎寨，故当地人至今把仇池山称为大山寨。

伏羲传说出于仇池，《开山图》云：“仇池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相传人文始祖伏羲就出生在仇池山主峰伏羲崖的伏羲洞。仇池山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刑天葬首之处。陶渊明《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上古时期的氏族部落首领，也是炎帝的乐官。据《山海经》记载，刑天参与炎帝同黄帝争夺天下的炎黄战争，战败，黄帝派贰负之臣将刑天斩首，葬于常羊之山。而按照赵子贤和赵逵夫父子的研究，常羊山即仇池山。^[1]

仇池是氏人家园。《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2]氏羌族群原先游牧于青、甘、藏高原，春秋战国至秦汉，氏羌逐渐分离，氏人主要聚居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鱼豢《魏略·西戎传》说：在街、冀、獬道的氏人，“乃昔所谓西戎者”，“其自相号曰盭稚”。正因为仇池处四战之地，所以《水经注》引郑玄曰：“西（“西”字疑为“百”字之误）顷，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间，人有所于京师者，道当由此州而来。”活跃在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流域的氏人与秦人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左传·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胄裔也，毋是剪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剪其荆棘，驱其

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肴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左传·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到秦献公时期（前384—362年），秦的势力迅速扩大，大肆征服邻近部落，氏羌被迫流迁各地。

南迁的氏羌不断繁衍，形成耗牛种和越嶲羌、白马种、广汉羌等若干部落。《魏略·西戎传》载：“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郡治在今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洛峪镇——作者注），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氏，或号冉氏，或号白氏，此盖虫（蛮）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3]

汉代在氏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湍氐道、略阳道等十三氐道。

汉献帝建安中期，氏人部落大帅杨腾之子杨驹，勇健而多计略，率其种落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四面陡绝，因以“百顷”为号。至杨驹之孙杨千万时期，依附魏朝，魏封之为“百顷氐王”，此时汉王朝已经承认了这个只有百顷之疆的仇池国的合法地位。至杨千万之孙杨飞龙时期，仇池国逐

渐强盛，晋武帝封杨飞龙为征西将军，让其还居略阳（今甘肃秦安）。杨飞龙无子，便以外甥令狐茂搜为养子，改称杨茂搜，继承杨飞龙的封号和事业。杨茂搜为躲避战乱，率部落四千余家还保仇池，自号“辅国将军”。时天下大旱，关中多乱，士民多避乱出走，一部分关中人士避至陇上“世外桃源”——仇池国。杨茂搜延纳招抚，扩大了仇池国的人口。晋愍帝封杨茂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此后，杨茂搜的子孙一方面经营仇池国，另一方面先后依附于晋、前秦、北魏、刘宋等大国，取得大国的承认与封赏，接受宗主国所封赠的将军、刺史、仇池公、武都王等封号的同时，也为其宗主国承担守土安民和朝贡的职责。仇池氏帅也多次自己称王，如杨定晋孝武帝时，自号西王，死后被其叔伯兄弟西王杨盛谥为武王。杨盛死后，被私谥为惠文王。杨盛之子杨玄，被私谥为孝昭王。杨玄之弟杨难当，自立为“大秦王”，并改元“建义”，以子为世子，立妻为皇后，大有一统天下称帝的想法，后因国家多灾异，自降为武都王。

前、后仇池国存续了210余年，有茂搜、难敌、毅、初、国、俊、世、纂、定、盛、玄、难当、元和、僧、文度、文宏、后起、集始、绍先、辟邪等20位首领。这些首领既有子袭父位，也有兄弟、叔侄相继的。

仇池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晋太和五年（370年），仇池主杨世之子杨纂即位，与前秦断交。次年三月，前秦遣西县侯苻雅及杨

安、王统、徐成及羽林军左监朱彤等率步骑7万大举伐仇池。四月，兵至鸛峡（今洛峪黑虎峡），杨纂提兵5万迎敌，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卜靖等率千余骑襄助杨纂，与秦兵战于鸛峡，仇池兵溃败，死伤2万多人，郭宝部全军覆没，杨纂收残兵逃回仇池。苻雅攻克仇池，武都太守杨统恐惧，面缚出降，被苻雅押解到长安。前秦加封杨安为都督，镇仇池，并大量迁移仇池氏民于关中，遂空百顷之地，前仇池国亡。

太和六年（371年）10月，后秦与仇池发生大战。仇池主杨盛攻取后秦的祁山，进逼秦州，秦主姚兴亲自出征，会各军将领于陇口，遣建威将军赵根为前锋，立节将军姚伯寿为后应。大军入仇池境后，前将军姚恢出鸛峡，秦州刺史姚萁出羊头峡（今青羊峡），兵分两路进攻仇池，杨盛以压倒敌人的优势兵力，亲自督战，因姚伯寿畏缩不进，后秦军力不支，为仇池兵击溃。姚兴讨伐仇池失利，遂斩姚伯寿还师。

元嘉十八年（442年）十月，宋魏为争夺仇池龙门发生大战。武都王杨难当举全国之力攻蜀地汉中。十二月，宋主刘义隆召龙骧将军裴方明又发荆、雍二州兵，与雍州刺史刘真道共同讨伐杨难当。次年五月宋军到汉中，连克武兴、下辨、白水、兰皋、直逼仇池，大败仇池兵，杀仇池将军苻弘祖，生擒杨保炽、杨虎。仇池国丞相杨万寿等请降，杨难当携家眷出塞峡奔上邦，魏遣中山王辰迎接杨难当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七月，北魏主拓跋焘下诏，以百万大军，十路

伐宋，为杨难当报仇。是年冬，安西将军古弼统陇右各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从祁山南入，古弼遣永安侯贺纯，河间公元齐进攻塞峡道（今大湾家峡），与宋守将姜道祖战于峡中，姜道祖退保塞峡亭（今石堡），北魏军乘胜进击，姜道祖弃亭南逃。征西将军皮豹子、琅玕王司马楚之督关中兵自散关西入，攻克下辨（今成县），大败宋军，北魏收复仇池，以皮豹子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元齐与杨保宗镇守洛谷（今洛峪镇）。至杨辟邪又据州反叛，到宋后废帝二年（474年）为刘宋所灭，杨氏之祚始绝。

齐建武四年（497年），武兴氏帅杨灵珍反魏，魏遣河南尹李崇统兵讨伐，击败杨灵珍。杨灵珍西奔仇池，据守鹫峡，遣其从弟杨建提兵屯龙门（今坦途关），在龙门以北数十里峡谷中（指青羊峡一带）伐木塞道，以拒魏军。李崇命统兵慕容将军率兵5000，从他路夜袭龙门，大败杨灵珍，李崇亲自率兵攻破鹫峡，活捉杨灵珍的妻子儿女，杨灵珍败逃汉中，魏军再克武兴（今陕西略阳），北魏以李崇为梁州刺史，镇仇池。^[4]

元明清时期，仇池仍是军事要地。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明固原副将武大定起兵反清，斩杀清道臣吕鸣夏、游击李变龙、周存德、马应熊、魏尚忠、守备赵文光、董师吉后，攻秦州失利，遂入西和，包围西和城（今上城）。时城中缺水，军民被困。典史张文焕择地掘井，水出，民赖以安。武大定日久未克西和城，遂于七月进据仇池。肃王豪格遣贝子满达海、辅国公哈尔

楚浑、蒙古固山额真准塔巴图鲁等统兵围剿，武大定部将石国玺率部投降，高如砺、蒋登雷等被尚书星纳击败，武大定只得败走四川三台山。

二、“仇池”地名读音辨正

英国语言学家柏默（L. R. Palmer）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语言不可能离开历史文化而存在，语言的背后往往有历史文化。从地名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从地方文化也可以窥探相应的地名的文化内涵。仇池原是一个氐人的集中居住区，后氐人又与秦汉民族杂居混处，这种文化积淀必然当地语言产生影响，当地的方言俚语中至今仍有氐羌文化的痕迹。从考察语言的角度出发，尊重历史，遵循人文，尊重当地的语言习惯，按照约定俗成的名物逻辑和态度确定仇池地名的读音，对发掘和认识仇池的历史和陇南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地名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是相互区别的符号，也是一种文化，地名之中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就是决定地名读音的基本要素。地名读音既有强制性，又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因此，地名读音应该也必须按照当地百姓世代相传的读音来读。

仇池在当地读音与规范的普通话词语读音不同。按普通话读音来读的人并不生活在仇池当地，而生活在当地的仇池人自古以来就只按当地的方言土音来称呼其村落。语言的传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过去的历史文化

信息往往沉淀在现实的方言俚语中。方言俚语因其自身的特点，往往保存了较多的古代词语和地域文化信息。

仇池所在的西汉水上游是古代氐人的传统居住区，氐族是一个农牧业发达的民族，文明程度较高，但他们只有自成系统的语言，但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作为氐民族中心居住区的西汉水流域，又有大量秦汉民族与之杂居混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对各自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语言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仇池”一词就有可能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氐族词语。而“仇池”又称“河池”，说明“仇池”与“河池”是氐语中的一个词汇，或者是氐人语言中的方言土音。因为“仇池”“河池”以及氐人自称的“盍稚”语音非常接近，“河池”是氐人对其中心居住区的称谓，古人往往用居住地的名称来称呼该居住地之人，甚至把民族族号作为该族的姓氏。由此可见，^[5]部自称“盍稚”，扩而大之，则把氐人生活的中心地域也称为“盍稚”，而“仇池”除了可以称“仇池”外，同时还有一个称呼“河池”。“河池”这个地名，所指有时为“仇池”地区，有时也指氐人居住的中心地带，现在的徽县一带，也曾被氐人称为“河池”。不管是仇池地区还是嘉陵江流域的徽县一带，汉魏晋时期都是氐人活动的中心地带，由此可以推断，仇池虽指“高大的神山”，是氐人心目中的圣地，有特指的意义，但也有泛指的意义。所谓特指，就专指“仇池山”；泛指，则为氐人生活和活动的中心地带。“仇

池”“仇夷”“河池”“盍稚”在古代声韵相近，只是汉语对其读音记录的词形相异而已，这三个词可能是氐语中的同一个概念，是用汉语读音记录的氐语词汇和地理概念，它的汉语意思就是指高大的神山。现今，在仇池当地，村民们把他们生活的仇池山，也叫“大山寨”，而把与洛峪河隔河相对的西高山称为“小山寨”。

氐人有自成系统的语言系统，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符号系统，古代氐语大多是用汉字来记录的，这样，氐语中的一些词汇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汉语汉字系统，演变成汉语词汇。氐人内部互称“盍稚”，而汉人则称之为“氐”。按南京理工大学唐纯善教授的观点，“盍稚”的“稚”，上古音为dīei，与“夷”同音，故“盍稚”与《禹贡》中的“和夷”可相比对。唐纯善引用温少峰的说法云：“和夷之‘和’，与氐人自称‘盍稚’之‘盍’群纽双声，歌盍通转，是同音异写。唐善纯认为，“和夷”、“桓是”，是一个氐羌语词，不可用汉语解释。李方桂将“桓是”之“是”的上古音拟为*djig，而“夷”的上古音为dīei，认为它们是同音字，也就是“氐”。“仇池”在古代亦称“仇夷”，而氐人自称的“盍稚”“和夷”“仇夷”，其切音都是“乞”。

古代氐人强悍、勇猛，由古代氐人演化而来的现代云南哈尼族人自称 $xa^{31}n̥i^{31}$ 。 xa^{31} 含有强悍、勇猛之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了古代氐人强悍、勇猛的民风。以此推之，“盍稚”的“盍”，“和夷”的“和”，

“桓是”的“桓”，都是词头 xa^{31} 的对音。而“稚”“夷”“是”则无疑是“氏”的对音。“盎稚”“桓是”“和夷”的意思就是勇猛的山里人，表现的仍是氏人强悍、勇猛的民风。^[6]

也有学者认为，宋代音韵学家徐锴在整理中古音韵后，j、q、x与zh、ch、sh就已经分开了，但也有音韵学家认为j、q、x与zh、ch、sh，在明代才严格分别开来。但不管是明代才严格区分开来，还是宋代就已经严格区分开来，至迟在宋明之前，j、q、x与zh、ch、sh是不分的，此前的仇池都应该读仇(chóu)池，不该叫仇(qíu)池。就是到现在，在陇南方言中仍然大量存在j、q、x与zh、ch、sh不分，x与h不分，j与g不分，n与l不分，n与q不分，ch与q不分等情形。“仇池”一词的读音显然是把“ch”与“q”没有分开。

陇南大部分地区，至今仍将部分zh、ch、sh声母的开口呼韵母字，读作相应的z、c、s声母的字。如将“枝、抄、是”的声母分别读成z、c、s，而“知、超、世”等字的声母则仍读作zh、ch、sh。g组声母也没有演变分化的遗迹，如“街道”读如“巷套”，“胸腔”读如“胸康”，“鞋”读如“孩”，“瞎子”读如“哈子”，“下来”读如“哈来”，这些字的声母仍为g、k、h。普通话中有塞音、塞擦音，分为不送气音和送气音两大类，如b—p，d—t，g—k，j—q，zh—ch，z—c等字母，但在陇南西和等地方的方言中，把一部分不送气音的字读作送气音的字，例如“鼻子”读如“皮子”，“有病”

读如“有聘”，“街道”读如“该套”，“下跪”读如“下溃”，“干净”读如“干庆”等。这些字的声母分别读为送气音p、t、k、q。此外，常见的还有zh与ch、z与c混用，如“柱子”读如“触子”，“在”读如“菜”，“坐”读如“错”等。举例如下：

陇南方言与普通话用字部分声母对照表

词例	普通话读音	方言词读音	声母	备注
仇	chóu/ qíu	chóu/ qíu/qí	ch—q	西和作姓氏读曰qí，其他如常
解	Jiě	gǎi	J—g	西和用作名词和动词都读gai
界	jiè	gāi	J—g	西和用作名词时读gai
解	xiè	hái	x—h	在西和用作姓氏读hai
瞎	xiā	hǎ	x—h	
惠	huì	xī	h—x	用作姓氏读xi
街	jiē	gāi	J—g	
吕	Lǚ	nǚ	l—n	
鸟	niǎo	qiǎo	n—q	

也有人认为，仇池名称的由来与仇池山上修身炼丹的古代道士仇维有关。关于这一问题，西北师大博导、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逵夫已有过严谨的考证和论述。仇维是周时人，仇池名字早在仇维之前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与神农伏羲联系在一起。《列仙传》卷上“仇生”条云：“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当殷汤时，为木正三十余年，而更壮。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师奉之。常食松脂。在尸乡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异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君，老而更壮。灼灼容颜，怡怡德量。武王祀之，北山之上。”这与乾隆版《西和县志·仙释》的记载大体一致。赵

逵夫《仇生·仇维·仇池山》一文中说：在仇池山修道炼丹的仇维就是《列仙传》中所说仇生，为我国传说中最早的神仙之一。“仇维，周时人，居仇池。池为三十六洞天之一。后仙去。山又名仇维。”这是仇维“仙去后”的山名，但仇维之前早就有仇池之名。仇维如果姓仇名维的话，则西和当地“仇”作姓氏时读“qí”而不读“qíu”，说明仇池之名与仇维无关。更重要的是，这样解释就把“仇池”一词当做汉语词汇解释了，但此解即使解释了仇池之“仇”，也未必能解释仇池之“池”，“仇池”在汉代《列仙传》成书之前，或者在周朝仇维居仇池修仙炼丹之前就已闻名于世了。

另有人认为，仇池山之所以叫“仇池”，是因为山顶原有一个大水池——天池，所以名之曰“仇池”。仇池山上有多处泉眼，所以杜甫吟仇池的诗，开篇即称其为“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仇池绝壁，峭峙孤险，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魏晋时期因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山体坍塌，池水外泄，才形成今天的特殊地貌。这种说法没有历史文献依据和地质地理方面的科学依据，仇池山上至今虽然多泉水，但山上并没有汉语意义上的“池”的迹象。

在西和县和成县一带，以“池”作地名的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西和县有“麻池”，成县有“索池”乡。这些以“池”命名的地方并非都有池，这也说明“仇池”地名与汉

语意义上的“池”并无关系。前文已经说过，“仇池”“仇夷”“河池”等词汇是用汉字记录的氏语词汇，“仇池”的概念与白马氏人的傩舞“麻昼”“池哥昼”等概念一样，是白马氏语词汇，而非古代汉语词汇，这些语素是不能分开解释的。

地名的认定还有一条规则，就是地名的叫法要尊重历史、人文和当地的习惯，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道士仇维是姓仇名维，则仇池就应当读作 qíchí，因为在西和当地，“仇”作姓氏讲时读“qí”而不读“qíu”。陇南市宕昌县，不少人读为宕(dàng)昌县，但当地人自古以来就读宕昌(tān chǎng)。这个地名的来历，也与仇池相似，是由古代的宕昌羌这一族系名称而来，原本是羌族词语的汉语记录，其由来已久，所以现在都改读宕昌(tān chǎng)县。西和县大桥乡的百姓和仇池村上码头、下码头、庵房里三个社的村民，世代只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山寨就叫仇(chóu)池山，而不知有仇(qíu)池山。

参考文献：

[1]赵子贤，《刑天葬首仇池山》，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3][5][6]唐善纯，山川唐的博客，勇猛的氏人。

[4]杜万鼎主编，《西和县志》（军事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陇南西和一中）

图式、空间及艺术

——静宁县威戎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研究

李安乐

内容摘要：静宁县威戎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表现出多个新的图式，呈现出新的墓室壁画艺术样式，反映了元代后期墓室壁画的艺术样式演进。对图式的变化的研究，在绘画空间、祭祀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将其纵深到其表现技法、艺术风格、艺术价值研究中。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对艺术研究而言，将补充元代艺术中许多新的艺术图式及艺术风格，此外对研究西北社会状况、民俗生活，填补地方史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武家塬 元代墓室壁画 图式 空间 艺术样式

2013年甘肃静宁威戎镇新华村武家塬发现一座元代墓葬，墓室坐北朝南，墓道为斜坡式，八角券顶墓室，内室平面长4米、宽2米；墓室四壁均有壁画^[1]。静宁武家塬的元代墓室壁画填补了甘肃地区元代墓室壁画的中奉茶图的空白，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华戎交融的灿烂艺术：静宁元代墓画》一文，从墓室壁画艺术角度进行了初步研究^[2]。兰州大学郭永利教授《甘肃境内的元代墓葬》在纵观甘肃元代墓葬的视野下，提出该墓室壁画标示甘肃地区新型墓室壁画的出现，以墓主人家居生活题材，替代传统的宋金墓室中的动物花卉和二十四孝行故事画

像砖^[3]。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的图式显示了许多新的特点，创新了许多图式，在图式中其对空间的表达及艺术特色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图式研究

（一）图式的比较

图式，是来源于西方哲学里的一个词汇，最早是由康德提出的。他认为：“所谓‘图式’，是先验的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又与知性相联系的纯粹形式。它是先验的想象力的产物。就其与感觉相联系而言，它是感觉的基础。”^[4]图式是一种经验化了的形式，是对单个的、片段的、零散的图像的有机

化、系统化。“图式又像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就能够在超脱一切物质实体和思想观念的角度审视艺术。”^[5]在后来的发展中，图式被主要运用到视觉艺术中，图式与观看相结合，图式成了视觉艺术组成形象实体和思想观念的最为基本的元素。图式的研究厘定了一个如何审美的方向性问题。图式在视觉艺术框架中具有图像性、传播性和心理结构。图式是以约定俗成的题材内容而演绎出来的程式化的模型，也是判断图像内容的方法。图式有繁殖和演变，在不同图式中，通过图式比较能够理清其脉络和所处的结点及位置。

在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存在着“一桌二椅”图式、“对坐”图式、“启门”图式、“奉茶”图式、“洒扫”图式、“待侍”图式、“门卫守护”图式。

1. “一桌二椅”图式

一桌二椅式对坐与夫妇共坐图像自晚唐五代逐渐出现，主要流行于北宋和金朝，考古发现集中于中原地区的下层汉人墓葬中。

一桌二椅图式最早不出现墓主的形象，虚位以标示其作为祭祀的空间位置。一桌二椅图式后来加入了墓主形象，这一图式被改变，传统的宋金墓中仍保存了椅子的存在，但在已发现的蒙元墓中，有部分已不再摆放祭祀用的桌子。另一个变化是，椅子的摆放由面向观者的并排摆放，变为左右相对摆放，再到蒙元时的斜角对坐。有意思的是，女墓主的椅子逐渐变得与男墓主的有区别：男墓主为交椅，女墓主为无靠背圆墩椅^[6]。

桌椅的变化，以及椅子体现男女尊卑地位，已标示了一桌二椅图式的彻底终结，新的图式：对坐图式已然替代了旧的图式。

如果从物的角度看，一桌二椅的图式仍然存在。武家塬墓室壁画中的《双屏对坐图》（见图1）中保存了较完整的图式结构。一桌二椅图式不过是一种延续性的残留，是对坐图式的前声。



图1 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双屏对坐图》

2. “对坐”图式

当墓主形象占据画面中宋金墓中标示墓主位置的椅子时，对坐图式就已诞生。从现有的墓室壁画资料看，最早的对坐图为河南登封箭沟北宋墓室西壁《夫妇共坐图》^[7]。这种对坐图，还保留了开芳宴痕迹。

对坐图式中的构成，张鹏将之概括为主要和次要的图像元素系列。主要元素：卷帘幔帐（组绶流苏挂饰）、墓主夫妇（或有变化）、一桌二椅（或二桌二椅）；次要元素：家具群、侍从及动物。其中存在着由简到繁再到简的演变过程，组合关系也有动态的变化：如桌上置酒具、食具、食物、茶具、文

具等，墓主背后有一扇或两扇屏风。^[8]纵观对坐图，我们发现其实最主要的元素是墓主夫妇及坐具（有的为椅子，有是为凳子）。

对坐图式，从男女墓主占据位置来分，有男左女右式和女左男右式，分别表征了不同中心地位；从对坐距离来分，有无桌近距离式（如内蒙古赤峰市宁家营子元代墓室《对坐图》）和有桌分割式（如武家塬元代墓室《双屏对坐图》）；从男女墓主主次地位来说，有平等式（如陕西蒲城县张安答不花夫妇墓《对坐图》）和不平等式（如山西同县红峪村武氏夫妇墓室《对坐图》）。武家塬元代墓室《双屏对坐图》，其对坐图式属于男左女右式、有桌分割式和平等式。

显然，对坐图最为核心的元素是男女墓主及所坐椅子构成的对坐格局，其它的道具可繁可简。对坐格局中男女墓主的对称性、均衡性分布，揭示或指向了对坐图的中心位置，那个一直被虚位的中心及中间位置。秦大树提出由“一桌二椅”图式演变而来“夫妇对坐图”具有“灵座”的意义^[8]。这即时对坐图式中，由男女对称性对坐而指向中心位置所暗示出来的祭祀的空间。

3. “启门”图式

“启门”图式，宋金墓中较为常见。早期在墓室后壁，启门人物有妇人、女仆、男仆、小孩等。有启门图的墓画多是一幅，且多在北壁。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描绘了两幅启门图，即双启门图，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独特。此外，墓画中的启门图分布在东西两壁，内容以日常生活的洒扫和奉酒相区别。

与其它启门图相比较，武家塬墓室壁画中的启门图已经融合了奉茶图式和洒扫图式，只已半开的门标示启门图式。

4. “奉茶”图式

在宋元墓画中，奉茶奉酒图式，一般是相配套，左奉茶右奉酒，或左奉酒右奉茶。此外奉茶奉酒图式又往往与备茶备酒图式相结合。奉茶奉酒图式是备茶备酒图式由前期准备阶段转向直接侍奉阶段。奉茶奉酒图式中的人物行为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与备茶备酒图式中的人物保持相对的静止不同，是以即将要走向墓主人的姿态而出现的。“奉茶”图式，也极力展现了孝的意图，通过尊卑、长幼、主仆以厅堂式的家庭伦理秩序氛围展现出孝道的意图，一切围绕着墓主人。宋元时期统治者是极力提倡孝道的，元人张忠恕有言：“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为大事。”^[9]“祭如在”，必致其敬，如其亲存，侍死如生，此处在于孝道。

武家塬墓室壁画中的“奉茶”图式没有出现与之配套的奉酒图式及备茶图式，只有《奉茶图》（见图2）。茶水供奉这个似与宗教信仰有关。魏文思在《宋元时期壁画墓中茶酒题材研究》一文中指出，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墓这座道教领袖的墓中，只有备茶图，没有备酒图的细节，是“茶祭”，极有可能饮茶文化和道教飞升有关。^[10]道教的醮献仪式中多用茶代酒，有“酒肉不可不节”“不得饮酒食肉”等戒条^[11]。武家塬墓室壁画中的“奉茶”图式表现的也极有可能是“茶祭”的道教信仰。



▲图2 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
《奉茶图》



►图3 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
《洒扫图》

5. “洒扫”图式

在宋金元墓室壁画中，“洒扫”图式几乎很少见。“洒扫”图式即是洒扫庭除、打扫卫生的行为，也是修身修养之根本礼节。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有：“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此外“洒扫”图式又包含有外向性的涵义，即“洒扫以待宾客”。以洒扫隐含待客的图式，表明了墓主人的社会性交

往。

武家塬墓室壁画中的“洒扫”图式（见图3），正是上述儒家理念的体现，展现了蒙元时代儒士生活在修身修养层面上的诉求。

6. “待侍”图式

在武家塬墓室壁画中，“对坐”“奉茶”和“洒扫”图式中又包含了一种较小的图式：“待侍”图式（见图4）。“待侍”，即等待侍奉。在“待侍”图式中包含了礼仪性待侍和实质性待侍。礼仪性待侍中，描绘了持帐簿以备查验、持骨朵以备施威的两种静待的形式，涉及到墓主人权威的构架。在实质性待侍中，描绘了持衣物以备增减、持手杖以备出行、持砚台以备书写、持唾壶以备身体之需四种静待的形式，涉及到墓主人生活

的方方面面。

7. “青龙白虎守护”图式

有了“青龙白虎守护”图式，才算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墓室空间。在甬道口，汉代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兽的守护图式，宋辽墓室壁画中，多绘武士守护。元代青龙白虎守护的图式不多见。武家塬墓室壁画，为青龙白虎守护的图式。青龙白虎既为神兽，又标示男左女右的男女墓主的象征性守护，生成了“对坐”图式与“青龙白虎守护”图式的互动。“青龙白虎守护”图式不在置身众人物之外，而是与墓主人关系密切。

（二）图式的来源

墓室壁画的图像图式从何而来，涉及到粉本问题。粉本，即古代绘画的底稿。元代画家夏文彦在《图绘宝鉴》对粉本的定义做了详细的叙述：“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前辈多宝善之。孟其草草不经意处，有自然之妙。宜和、绍兴所画粉本多有神妙者。”^[12]

墓室壁画的绘制一般依照一定的粉本，由画工来绘制。李清泉《粉本——从宣化辽

墓壁画看古代画工的工作模式》一文中，通过对宣化辽代张氏族墓壁画的比对、分析，从中归纳出五种粉本使用的方式：“1. 依粉本原样复制或稍事移改；2. 物位置的腾挪闪让与打散重组；4. 不同粉本的相互拼合利用；5. 粉本的借用。”^[13]在对武家塬墓室壁画的图像图式研究中我们看出了粉本的使用。事实上，在具体的绘制中画工不一定严格按照粉本来绘制，总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加工改造，从而生成新的变种粉本。

此外粉本的流传，可能还涉及到移民问题。元初实行军屯及移民，静宁处于人口大流动，民族大融合之地。据《元史·兵志·屯田》记载，至正二十一年八月（1284年），调燕京戍守新附军436户于德顺州威戎立屯，垦田164顷80亩，为陕西万户府屯^[14]。静宁威戎地区移民，带来了新的粉本样式。武家塬墓室壁画中有内蒙古、辽宁、陕西等地元代墓室壁画的印记，这与元代的移民有关。由移民将其原居地的墓葬壁画的粉本样式带到了静宁。



图4 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侍待图》

此外，静宁地处六盘山安西王府和巩昌府中间，且在元初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隶属于巩昌府^[15]。定西漳县汪世显家族墓M13中小木屋图像上的女墓主、侍女等形象与武家塬墓室壁画中形象极为接近。粉本的流传与巩昌府的管辖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二、空间研究

（一）绘画空间

中国古代绘画对三维空间不太重视，大多表现二维空间，在界画中表现建筑的空间也显得立体感不够强烈。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双屏对坐图》中的空间表现很特别，画出了地平线，通过地板有意无意的不准确的透视，以及身后屏风斜放的指向性将北壁墙面虚幻出一个纵深度极佳的空间。正中供桌的透视画极准，具有很强的空间感。有意思的是地平线刚好画在两个壁龛的下缘，给人造成了壁龛就在地平线上，而不是悬在墙上的感觉。

1. 平行透视

平行透视法是一种表现正面常用的透视图，物体的正面与画面平行，只有一个灭点（即主点）在画面的中心，这种空间构图方式也称太阳图式，由中心向四周外放射。武家塬墓室壁画中就采用了平行透视，不过由于技术等原因，在画面中出现了两个灭点：由屏风人物形成的灭点和由正中间供桌形成的灭点。这点符合中国古代画家多点透视的习惯，而非西方的定点透视。有意思的是，由于两个灭点在画面中的存在，使观者的视觉焦点聚集到供桌上方设置灵位的位置。

2. 对地板空间的描绘

中国传统绘画在空间表现中特别注重画面的空白，往往化实为虚，虚实相兼，以求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的艺术目的。中国古代画家往往会留空白以表示地面，不会像古代西方画家那样用颜料填满地面，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在中国人物画中，对地面地板的描绘是非常少的，仅刘松年《瑶池献寿图》（台北故宫博物馆）、宋代佚名《瑶台步月图》（北京故宫博物馆）等极少数的画中。武家塬墓室壁画中对地板的描绘有助于增强绘画空间感，这种表现法在元代墓室壁画中非常罕见。极近繁琐地描绘地板空间，可能与雇主的需求有关，表现出元代墓室壁画中对墓主状况如实再现的绘画性需求。

（二）祭祀空间

对坐图中一个灭点的平行透视法，将画面的焦点聚集到北壁供桌上方虚位以待的灵位位置，而男女墓主及屏风的向外放射性分布，更是强化了这一焦点，东西两壁的人物全部局聚焦到灵位位置，生成一个祭祀空间。这种对空间的表现手法是极其独特的，提供了一个与潜在观者对话的视域，生成象征意义的空间。

同时，对坐图中的“香花供养”也表明了祭祀与供奉的空间。在道教信仰中，莲花有特别的象征，有“永为供养”的意思。两幅《启门图》（《奉茶图》《洒扫图》）以及南壁的神兽守卫，一起构成了一个由外进入院落的空间，窥视到在忙碌着的仆佣、墓主

人夫妇肃然坐于祭堂之上的生活与祭祀融为一体空间视域。

对坐图中的墓主夫妇形象，在墓室中同时又具有“灵位”的作用。整座墓室是围绕墓主“灵位”展开的祭祀空间。而静止站立在墓主夫妇身边的子女，作为专门侍奉墓主夫妇而从始终陪伴左右。通过墓主人夫妇侧身对坐两角，中置供桌可以判断墓主人扮演了“祭祀者”和“被祭祀”的角色，相当于“神主”或“主位”。这样使墓室成为祭祀诸神主的祭堂，墓室空间在死者“永宅”的基础上，具备了子孙奉祀、香花永供的祭祀性质。而作为祭奉对象的死者，则在歆享子孙为尽孝所营造的供奉和祭祀场景中履行着对在世子孙后嗣的垂佑荫庇。《对坐图》强化了墓主夫妇的形象在墓室中“灵位”的意义，静立的行为更像对先祖供养下的祭祀行为，其它的奉茶、待侍都是为墓主人的供养和祭祀而进行准备。

（三）社会空间

宋金元墓室壁画中的对坐图，二人呈对称结构，通常以男左女右的位置标示主次之。关于左右，是以研究对象的左右为准的，而不是以观者的左右位准。蒙古民族自古有尚右习俗，终元一代从尊右到尊左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马可波罗提到：“大汗开任何大朝会之时，其列席之法如下：大汗之席位置最高，坐于殿北，面南向。其第一妻坐其左。右方较低之处，诸皇子侄及亲属之座在焉。”^[16]在男墓主为汉人、女墓主为蒙古人的武家塬墓室壁画对坐图中，单纯依靠男

左女右位很难确定男女的主次地位。

不过与男女左右相配套的青龙白虎图案为我们探究男女主次地位提供了一个线索。根据左为青龙为阳，代表男性，男宜高大，右为白虎为阴，代表女性，女宜低矮，故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的青龙比白虎高；在对坐图中，男墓主比女墓主高，男墓主后的屏风也比女墓主高，地板中表现的地平线男墓主这边也被抬高。这表明了左为尊位，男墓主为主，女墓主为次。从男女坐位来看，男墓主为尊。但是在女墓主旁边有象征权力的骨朵，骨朵的位置标示了蒙古族的女墓主非同一般的身份地位，足以与汉人的男墓主分庭抗礼。

在武家塬墓室壁画中，男女性别又将墓室空间中分割为两大空间：以男墓主为代表的男性——青龙的空间、以女墓主为代表的女性——白虎的空间。男性——青龙空间占据画面的右边，女性——白虎空间占据画面的左边，形成左男右女、左青龙右白虎的空间格局。男女区分了性别，又分割了社会空间，将人物阵营化。同时，这种封闭式的，充满尊卑等级的金字塔式的、小家庭式的空间结构，表现出在家的庭院四合之中，主仆、男女、夫妇、长幼一切均处于社会秩序之中。

三、艺术研究

（一）技法特色

写实是武家塬墓室壁画的特点。这与元代墓葬壁画以力求形似的写实审美追求相吻合。元代人物画追求造型上的精准、色彩的

世俗性，同时对线条和形体结构的表达有所注意。用线顿挫有致，注意到用笔中的笔法表达，线条有质感层次的变化，不像一般的墓画用硬质笔或棍子上敷棉花画成。武家塬墓室壁画对线条的使用注意粗细线条的结合。在人物头部、手部等用挺拔有力的高古游丝描，刻画生动，线条细密绵长，流畅生动，圆润舒展，极富韵味。人物衣服用大兰叶描，中锋用笔，宽阔挺拔，笔笔坚实。同时，注意线条对空间和不同质感的表达，侧重线的虚实、轻重、缓急，使画面中的线条极富张力。

元代人物画的写实能力有所提高，开始注重对立体感的表达。王绎在《杨竹西小像》一画中首创使用淡墨对人物的腮部进行晕染，使人物的立体感更强。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在人物面部也进行晕染，以突出人物头部的立体感。

当然，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存在着一些程式化的处理，比如西壁《奉茶图》中，奉茶的女仆和门外手持砚台的女仆形象极为相似。东壁《洒扫图》中，门外两名男仆的面容也极为接近。此外，可以看出画面人物和其它物件为两人所画的痕迹，这也与程式化相吻合，极有可能是师徒二人合作的结果。

（二）艺术风格

在北方的元代墓室壁画中，依据其艺术风格可以划分为两种样式：一是简练粗犷的内蒙古赤峰样式，包括山东、辽东等地，其画风粗犷，表达简练，如赤峰市元宝山墓室壁画等；二是精细华丽的陕西样式，包括山

西、河南等地，其造型生动准确，线条到位，设色明艳华丽，如西安韩森寨墓室壁画等。

对照内蒙古赤峰样式和陕西样式，武家塬墓室壁画的风格处于这两种样式之间：简约而不失生动、有粗放有精致，这从人物表现的粗细结合及画面中的粗糙与精致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对男女墓主的描绘，造型严谨，设色典雅沉着，强调在写“形”中对“神”的表达，具有较强的艺术风格。

（三）艺术价值

1. 人物形象生动传神

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人物的造型精准而不呆板，流畅而洒脱。人物形象精美雅致，特别是西壁《奉茶图》中抱包袱的女仆，体态孱弱，面容清新秀丽，明眸红唇，极为生动传神。

又如对男墓主描绘，人物比例和谐，特征准确，用笔简洁，挥洒自如。既重视外在形象又着力于内在神韵，有元代著名肖像画家王绎人物画的特色。

2. 创造了许多新的图式

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对旧有的图式进行了突破，创造出许多新的艺术图式。“启门”图式中的“双启门图式”，改变宋金独启一门的图式。“对坐”图式中，出现了有供桌分割和男女平等式的对坐图式。“洒扫”图式，是在其它墓室壁画中尚未见到的图式。全方位的“待侍”图式，展示了墓主人学习、生活、出行、饮食、休闲、起居等从身体到物质到精神各个层面的生活。

3. 对女性空间世界的表达

在武家塬元代墓室壁画中，人物的描绘总体显得比较肃穆凝重、低沉凄迷，具有墓室壁画的一切特征。但西壁《奉茶图》有一大亮点，对原有图式的学习与突破，对人物形象的传神表达。抱包袱的、持砚台的、执茶壶的和端茶盏的四个女仆的形象，被巧妙地安排在“奉茶”这个小插曲中。怀抱包袱的女仆身着艳丽衣裙，年纪正值妙龄，体态娇小柔弱，面容清新秀丽，明眸而红唇，浑身焕发着青春的活力。画工描绘出了女仆天真单纯的一面，用笔简练，注重衣纹和面部的不同用线带来的质感。特别是眉毛的描画，使整个人物跃然纸上，极为生动传神。另一侧那位双手持砚台的女仆则显得老成持重。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她比抱包袱的女仆年龄稍大些，神情严肃，昂然伺立，举止得体，似在注视北壁的墓主人。执汤瓶的女仆和端茶盏女仆也描绘得非常生动：执汤瓶的女仆双手执汤瓶，从室内款款而出，与门外端茶盏的女仆交谈；端茶盏的女仆回过头来与之交谈，动作与神情的描绘极为生动，似乎可以让观者听到裙裾窸窣之声和女性的莺莺细语。

四、余论

武家塬墓室壁画，从服饰、坐位、人物形象等推断应为元代后期墓葬。

关于蒙汉联姻。从墓画的主人及其蒙汉服饰特色看出，合葬的墓主人夫妇是蒙汉联姻的家庭。男墓主是汉人，而女主人是蒙古族，这说明在距离六盘山安西王府比较近的

静宁，生活有许多蒙古族人，且逐渐融入汉族的生活，并有联姻。

关于宗教信仰。从《奉茶图》中的茶祭、供桌上的莲花和青龙白虎等形象，可以看出墓主人信仰道教。

关于当时的生活。墓画反映出墓主人是富足的中产阶层家庭。此外，还反映出当时仍流行宋代以来点茶的生活时尚。

武家塬墓室壁画中呈现出不同于已发现的元代墓室壁画新的艺术样式，艺术表现手法独特，较为真实的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志荣：《静宁发现元代墓壁画》，《静宁文史》，2013年，第6期。

[2] 李安乐：《华戎交融的灿烂艺术：静宁元代墓画》，《西北民间文艺研究（陇东南卷）》（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5-133页。

[3] 郭永利：《甘肃境内的元代墓葬》，《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出版社，2018年，第235页。

[4] 马新国：《康德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9-52页。

[5] 袁铎：《艺术图式研究——图式概念和理论运用》，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3.20，第11页。

[6] 内蒙古赤峰市宁家营子元代墓室《对坐图》，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墓室壁画全集·宋辽金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辽宁凌源富家

屯一号墓元代墓室《对坐图》，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墓室壁画全集·宋辽金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7] 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墓室壁画全集·宋辽金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8] 张鹏：《勉世与娱情——宋金墓葬壁画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妇共坐》，《美术研究》，2010年，第4期。

[9]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45-151页。

[10]（元）脱脱等撰：《宋史》，第409卷，《张忠恕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8581页。

[11] 魏文思：《宋元时期壁画墓中茶酒题材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8.5.27，第38页。

[12] 施舟人：《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13]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14] 李清泉：《粉本——从宣化辽墓壁画看古代画工的工作模式》，第37-38页。

[15]（清）嵇璜、刘墉等撰：《钦定续通典》，卷六，《食货六·屯田下》。

[16]（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十，《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29页。

[17]（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18-219页。

（作者单位：静宁县文萃中学）

治家之范本 ——读陈贵辉《陈家沟延鼎家史》

陈金有

按：中华民族对家族谱系的朔根追源，对优良家风的总结传承，诞生了华夏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家谱家史。几千年的传承，使家谱家史与国史、方志合称为中国历史的三大主要文献之一。陈贵辉积十年之功写就的《陈家沟延鼎家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家史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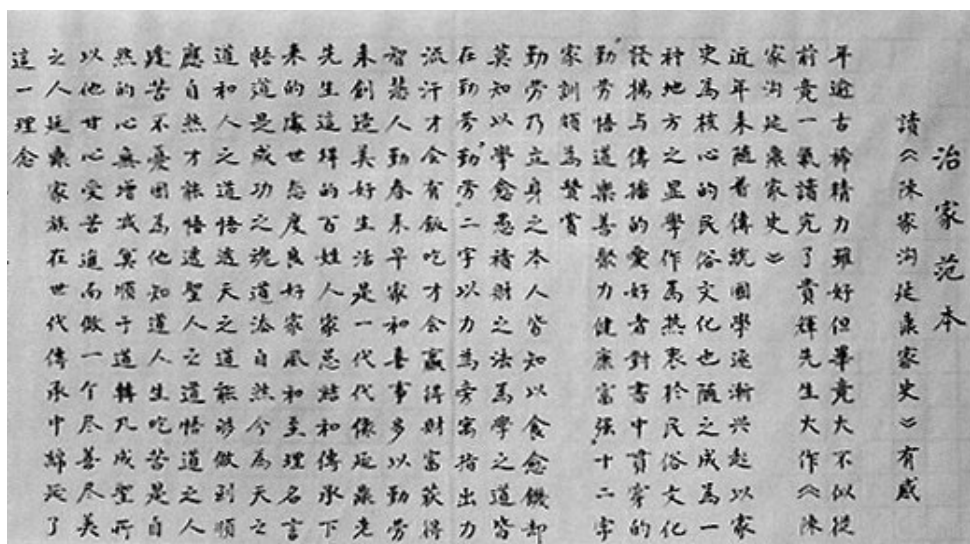
年逾古稀，精力虽好，但毕竟大不似从前，竟一气读完了陈贵辉的《陈家沟延鼎家史》。近年来，随着传统国学逐渐兴起，以家史为核心的民俗文化也随之成了一些地方的显学。家谱的编修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陈家沟延鼎家史》中贯穿的延鼎一族勤劳、悟道、乐善、聚力、健康、富强的家训便是对优良家风的总结。

勤劳乃立身之本。人皆知以食愈饥，却莫知以学愈愚。积财之法、为学之道，皆在勤劳。“勤”与“劳”二字，都以“力”为旁。寓指出力、流汗才会有饭吃，才会赢来财富、获得智慧。“人勤春来早，家和喜事多”，以勤劳来创造美好生活，是一代代像延鼎老先生这样的百姓总结和传承下来的处世态度、良好家风和至理名言。

悟道是成功之魂。道法自然，分为天之道和人之道。悟透天之道，能够做到顺应自然，才能悟透人之道。悟道之人，逢苦不忧。因为悟出了道理，知道人生吃苦是自然的，心无增减，冥顺于道，转凡成圣，所以甘心受苦，进而尽力做一个尽善尽美的人。延鼎一族在世代传承中绵延了这一理念。

乐善是为人之根。乐善指乐于行善，喜欢施舍助人。不但做善事，还发自内心，真心诚意，态度和美，让得善者如沐春风。乐与善二者结合，方是真善。躬耕以养心，乐善以修行。延鼎一族传家如世间最善的水一般，以德行包容万物，以善举泽润乡里。

聚力是成功之要。亲人之间血浓于水，兄弟姐妹和和睦睦，同仁之间互爱互助，邻里乡亲和如一家。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



生产力。聚集各方正能量，同向而行，将内耗降到最低，乃成功之捷径。国如此，家亦如此，延鼎一族正是这方面的楷模。

健康是立家之根。延鼎老先生教子，把健康当作最大财富，认为健康是一，事业、金钱、功名等都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其余皆为零。虽为一介农夫，但见解何等高明。

富强是兴家之基。历史一次次证明，覆巢之下无完卵。国家富强安宁，是每个家庭持续发展达到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富强民主文明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更是每个家庭朝思暮想的理想状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每一个家庭的共同努力。不爱国何谈爱家，不爱家何谈兴家，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延鼎一族始终不忘初心，家风中贯穿了以国为家，爱国爱家的民族情怀。

陈贵辉倾数年心血，反复搜集，多方考证，终成延鼎家史，其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编排合理、装帧考究，不能尽言也。观其通篇，治学严谨与文化大义相融相合，令

人钦佩。虽为家史，实为不可多得的国史、社会史之缩影，为中国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通俗教科书。

余陈氏一脉，与贵辉同宗，皆为陈胡公之后裔。世居四川安岳，祖父清末行医至陇上，后因避乱定居武山县鸳鸯镇，曾以德生堂泽被四方。余自幼习文，以书为友，尤善小楷，深得书法大家翟万益赞誉。退休十多年来，颐养于平川醉墨居，蒙乡绅高抬，弘扬地方民俗文化。数年间，受邀为地方名流、贤达人士撰修家乘谱牒60多部，皆以小楷亲笔书就。故每每休笔，众人赞叹之声不绝；而余静夜细观，亦欣然视为完美之作也！然，读罢延鼎家史，与之相比，除却小楷工整书写之外，竟寻觅不出任何能超越陈贵辉之处，实在汗颜之至。掩卷长思，惟感佩贵辉同宗对国学文化的贡献，以文为记！

(作者单位：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医药发展史述略

赵志飞

内容摘要：平凉，中国医药的重要发祥地，在医药文化发展史上，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最早发现、使用和推广药品，最早种植、采集、贮藏药品，最早开始炼制丹药，率先规模种植和生产药品，创立了适合平凉自然条件的药品种植模式，提高了种植技术和品牌意识，较早开辟了外贸流通渠道。改革开放后，平凉医药经济不断发展，“两网建设”等药品管理经验全国推广，医药发展达到又一次高峰。

关键词：平凉 医药 发展史

平凉历史悠久，医药发展源远流长，是中国药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伏羲时代

平凉医药学，起源于伏羲、岐伯时代。据《帝王世纪》记载：“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伏羲，古成纪（今静宁县）人，最早发现、认知和使用植物药品，教化人识别药草，知所避就。传说女娲氏教人用口咀嚼或用手搓揉药草取汁涂患处消疼止肿。岐伯，平凉人，《甘肃新志》记载：“岐伯生而神明，通脉理，黄帝以师事之”，与黄帝共同商定《黄帝内经》。传说仙人广成子入崆峒山石室修炼，在西侧峰顶设

炼丹亭、炼丹炉炼制丹药，庄子《在宥》记载，黄帝亲临崆峒山，向智者广成子请教治国之道和养生之术。《静宁县志》记载：“距今7800年前，静宁就有人类采集和农作物种植”；在泾川县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有犀牛、象、虎、鹿等动物化石和磨制精细的尖石器。伏羲、女娲、岐伯的用药经验产生了平凉蒙昧时期的医药学思想，肇启了医药学文明。但因“伏羲尝百草制九针”为后世传说、《黄帝内经》实为后世医药学家假托整理，故这一时期平凉医药的发现与认知，只可说是传说时代。

二、夏商周时代（前2146年至前770年）

夏商周时期，平凉的密、共、芮、空桐

等小邦国巫医管理疾病和药品，将迷信、传说与治疗经验结合应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记载，商朝平凉先民在长期的食疗和咀嚼、揉搓、捣、碾取汁外敷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植物熬制汤液萃取药物的汤剂法，供人服用，用酒和热水为病人消毒祛肿，用骨针、石针和青铜刀作取刺脓用具。

周朝，平凉医药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密国宫廷的巫和医开始分离，医和药开始分工，巫专司卜辞，医负责施治疾病、保管药物库藏与供应，还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浆人”官职，认识到酒不仅食之香醇可口，还能用于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医药科学战胜了巫神迷信。芮王在安口建窑开始手工制作陶器，逐渐用砂锅陶罐熬制补品汤药，崇信县发掘的西周时期墓葬文物中有以物易物（药）的贸易痕迹。

三、春秋战国时代（前 770 年至前 221 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铜器的应用和铁器工具的发明，生产力大大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更加进步，药品经济和药品商业有了长足发展，药学也跟着演进，巫、医进一步分流，义渠戎国建立了官办医院，专门用药物防病治病。据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记载，毒药、艾等新药逐渐发现，砭石、铁针等医疗器械逐渐应用。《黄帝内经》整理问世，奠定了中国医药学的基础和发展趋向。

四、秦汉时代（前 221 年至 219 年）

秦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好神仙”，于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

年）西巡平凉崆峒山，寻求长寿之术。在秦朝存续的 15 年中，平凉各郡县都设有医长，医长遵从郡县职官安排，听命于太医，管理郡县医药卫生。医长之下设药长，管理药府储存的药物，主持药物之事，上对医长负责。

汉代，匈奴多次入侵犯边，戎、氐、羌与平凉汉族交替聚居，每当战争停歇，汉朝就向遭受重创的平凉一带移民，移民将先进的医药思想、医药科学带到了平凉，促进了平凉医药的大发展。在郡、县、乡、亭四级政权机构中，郡府设“医工长”，以“主医药”，下设侍医、药丞、方丞；县设医丞主治医疗，设药丞管理处方及司药；乡吏兼管医药卫生；亭一级设亭父，掌管“开闭扫除”事务，兼管药品。《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延禧五年（162 年），皇甫规镇陇右，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相当于传染病隔离病院），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赵充国与羌人作战时，给平凉戍军配发一种酒类热性药“发寒散”，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在平凉的阿阳、泾阳、临泾、阴密、月氏等边塞设立“关市”，市内分列肆，肆内设店铺，与羌、戎等少数民族交易粮食、盐、铁器、皮毛制品和中药材等。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各族的麝香、肉苁蓉、乳香、安息香等香药经平凉输入长安，中原的肉桂、生姜、黄连、大黄、土茯苓等经平凉输出西域。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220年至581年）

三国，平凉偏安一隅，社会相对安定，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药品经济和药品应用迅速发展，与西域一直有药品贸易往来。当时，平凉郡县按照曹魏中央建制，设药长管理药品研制和购销使用，设医校尉管理药品发放领用和贮存养护，军队中设行病帅管理部队医疗卫生和药品事务。

西晋，平凉人皇甫谧，著书立说，采药行医，教育后代，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灵枢》为基础，结合历代医药学名家论述和经验，整理总结了针灸学，于晋泰康三年（282年）著成《黄帝二部针灸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尊为针灸学开山鼻祖。唐大足元年（701年）《针灸甲乙经》，被日本《大宝律令》规定为学习医学必修课，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被朝鲜医学制度规定为必修课。皇甫谧晚年居住在灵台县独店乡张鳌坡村，另著有《寒石散论》《巢氏病源》等。《庄浪县志》记载，东晋时期，葛洪曾访问崆峒山，在庄浪县紫金山居住多年，潜心探究炼丹技术，认为名山幽静远俗，“可以精思，合作仙药”。

南北朝，南方的药材经边镇平凉通关，西域药材郁金、苏合香、沉香、天竺的琥珀、郁金、珍珠，波斯的朱砂、水银、薰陆、青木香、胡椒、荜拔、香附、雌黄等经平凉向内地贸易，平凉的甘草、黄芪、大

黄、党参等药材上贡朝廷。苻坚时，平凉州郡设定市，市官朝启市门，日落击鼓罢市，各地采摘药材均在市内互换或销售，凡在市内交易，无论是坐商还是行贩，均要征收关市邸店之税，小商贩凡入市门贩卖者，人交一钱，如开店经商，则分为五等，按等级征收。北周宇文泰到庄浪县水洛镇巡边，派士卒收购款冬花、杏仁等药物以供军队使用。从出土文物来看，当时贮存药品的器具已由竹木箱框、柜架和麻布袋等，转向将贵重药品用瓷器贮藏。

六、隋唐时代（581年至907年）

隋朝，平凉郡府县衙参照朝廷建制，设尚药局和医学博士，郡府设医师及司药人员2-3人，各县设1-2人。隋朝中期，平凉各重要城镇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购销两旺，“西域商人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西域胡商到平凉或经平凉到达陕西关中和河南洛阳从事贸易，本地地道药材成批出口，外地特色药品通过南来北往的客商输入平凉。

唐朝，贞观三年（629年），平凉各州、县置医药博士，官秩从九品下。开元元年（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官秩从九品上，主要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相关事务，收采地产名贵药材向朝廷上贡；博士之下设医学助教，执掌本草验方的收集、撰写；助教之下为医学生，于学习医药之余，负责偏远贫困乡村的巡回医疗。地方官吏诊病给药，多在州、县衙署设置的医药行

政管理机构，一般衙署在大门两旁厢房，或者在衙署大墙“破墙开店”，既承担州、县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受理医药行政事务，也为民诊病，赚取薪酬补贴。当时，平凉创办“养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但规模很小，设施设备简陋。在民间，药材行帮（行会）是当时管理药品种植和流通的重要组织，泾州、南使城（今静宁县南）、赤城（今崇信县境）、潘原（今崆峒区境）等城内各行会出售成品都有统一定价，以免引起同行间的竞争。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平凉各州、县作为土贡的珍贵药材有地骨皮、细辛、甘草、芍药、大黄等。唐太宗贞观年间到唐玄宗在位的百余年间，平凉“商胡”开设药店，交易药品达110多种，药材出口数量和利润都相当可观。平凉佛教医药也相当兴盛，唐初仁智禅师于崆峒山创建丛林，修建明慧禅院，于布禅施道之余，研究医药施治百姓，唐太宗李世民曾御书赐田。

七、宋金元时代（908年至1369年）

宋夏金，平凉统治者注重发展经济，药品在种植栽培、加工炮制、流通贸易、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得到极大发展。渭州（金改为平凉府）、泾州、德顺军等设置惠民药局，内置医学，设博士、助教各1人，掌治药物，治民疾病。惠民药局既负责药品收购、存贮、炮制管理，又负责经营销售中草药、汤药和中成药。当时，平凉各州、县官药局依据《宋刑统》规定，践行医事律令，规定了医生职业道德和医疗事故责任制，规范民间医药习俗，确保了中成药质量，药品行会

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宋朝平凉地方政府鼓励群众栽培中药材，品种有大黄、白术、五味子、甘草等10余种，民众引进和选用良种，用肥沃之地精耕细作，规模种植，面积增大，产量提高，基本满足了当时民用军用药品的需求。药品成熟采集讲究方法，根据节令气候、种植条件和药用部位之不同进行采集，确保了药品质量和疗效。炮制技术发展较快，大多药店能够对不同药品、按照不同用途进行清炒、炒黄、炒焦、炒炭、土炒、麸炒、米炒、蜜炙、酒炙、醋炙、盐水炙、姜汁炙、煅、煨、蒸、淬、飞等，以缓和药物毒性，引导药物归经，提高治疗效果。平凉境内汉、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交往密切，特色药市繁荣，官营、民营两种经营体制相互发展，农村“草市”萌芽，民间药商活跃，城市的药市、药摊、药贩和药膳供应渐盛。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宋和西夏订立和约，在边境实行“茶马互市”，有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即药市，官办和剂局、民间药坊增多。平凉向西夏输出的中药材以甘草、大黄为大宗，向朝廷供奉的药材主要有甘草、大黄、酸枣仁、地骨皮、生熟地黄、细辛、枸杞等10余种。这一时期，平凉发展成为甘肃东部药品商业重要集散地。药学教育趋于普及，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置德顺军后，宋仁宗“赐德顺军《太平圣惠方》及诸医书各一部”，平凉官方和民众颇受鼓舞，掀起学习“本草”“方剂学”热潮，印刷术的发展使医药学典籍增多，大批知医儒臣参与，各地书院、乡

学开设《伤寒杂病论》《伤寒明理药方论》《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等课程，指导医药学生背诵经典著作，传授医理、药理和药方知识，探索药性归经理论，依据“性味”和“法象”解释药效，注重临床实习训练。宋代仪州（今华亭县）乡贤聂从志，就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名中医。南宋迁都临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江浙一带，逐渐统治平凉的金在平凉府设立了医局，负责医药学堂，从事医药学教育，为地方培养医药学人才，为朝廷选拔太医。

元朝，平凉府、泾州、德顺州设惠民药局、施药局，设提领1名管理局事，置医学博士，官给药值，香药、药材贸易仍沿袭历朝一边行医一边卖药的传统，枸杞、红花、大黄、甘草、麝香、鹿茸等地产药品深受外地客商青睐。当时，平凉的大黄受欧洲和西亚商人欢迎，上市大黄售价高，且供不应求。种植药品建有药畦，保墒增产，加工药材开挖洗药泉井。医药学教育也得到发展，平凉城三皇庙内以师徒相授形式进行教学，久负盛名的平凉药王楼就是这个时期建成的。药店用瓷钵调剂研制药品，用瓷瓶、瓷罐、瓷坛保管贵细药品，用瓦罐、瓦缸、木箱保管普通药物，以刀、剪、钳、凿、烙等器皿作医疗工具。

八、明代（1369年至1664年）

明朝，平凉府由韩王袭领，政权稳固，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医药管理、医药经济、医药文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平凉府志》记载，明洪武

三年（1370年），韩王府设置惠民药局，在医户内选拔任命内、外官医提领各1员，执掌医药行政事务；韩王府内设良医所，负责王府官员、家眷和富商富户医药服务。《泾州志》《静宁州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官署中设置医学典科，管理医药行政事务，负责医药学培训教育。各里（乡）设医训科1员，设官不给禄，专司医药和医疗。抽调各地老药工，在重点产药区域开展药源勘察，普查出平凉野生药材有104种，藏量较大、性能用途明显的地产药材有地黄、牛膝、白芷、麦门冬、紫苏、车前子、青葙子、良姜、大黄、前胡、桃仁、枸杞、地骨皮、杏仁等46种，此为有史可查的平凉第一次药物普查。

中药加工使用“石臼石磨、竹篇藤萝、铁杵研钵、土灶淘锅”等设备手工炮制。一些有名望的大药店，在制作丸散膏丹过程中，严格做到“原药选择地道，配料严格，遵古炮制”，凡处方要求蒸、煮、煨、炒、刮、剔、捣等工艺，均不惜工本，清除杂质，然后水泛、漂净、蒸煮，使药材便于切制、质味佳美。中型药店生意比较灵活，多购进原药材自己加工炮制，有的向大药店购进药品。小药店多为民间知医商人开设，分布在平凉各个角落，药铺多用地产药材加工销售，价格低廉。

药品流通贸易兴盛，从太祖洪武到成祖永乐时期，习医家之书、熟谙和剂之法的私人开设商业性药局、药店、药行、药栈，精制丸散膏丹流通市场，出现了“五方辐辏，

商贾竞利”的局面。万历年间，经营药材注重产地和质量效果，大药店购进药品，多选择怀庆产生熟地黄、怀牛膝，茅山产苍术、元胡索，宁夏产柴胡，汉中产泽泻，山西产黄芪，齐州产防风，辽东产人参，四川产独活、羌活、升麻、当归，庄浪产大黄，温州产生姜，尤以河南的驴皮、阿胶，北京的紫河车，以及平凉的龙骨、龙齿和龙角最为珍贵，安息香、血竭、鸡舌香、沉香等从外国采购。药品贸易最兴盛时期，平凉卫向朝廷进贡细辛、茯苓、独活、骨碎朴、羌活、天麻、青箱子、甘草、款冬花、当归、防风、枸杞、天门冬、麦门冬等珍贵药材近30种。明朝中期，庄浪大黄以每斤五、六文钱的价格销售，一亩药可卖白银十两，十两白银当时能买到4000斤粮食。

官府加强医药学教育，指导各地书院和私塾开设医药学课程，培养出一批理论功底深厚、富有创新精神、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倍受群众欢迎的医官与吏目。《崇信县志》记载，洪武年（1384年），在县知事公署设置医学训科，“遴选深谙医理者”任提领。名医张好问撰有《张氏医精》《太素集》《时巢鉴》等，中医张希明和刘聪二人皆因诊视神明，治疗奇应，擅名一时，是这一朝代平凉的典型医药学代表人物。大名儒赵时春编纂《平凉府志》，总结宣传平凉医药学经验。医疗器械品种不断增加，出现了以铜、铁、金、银为材料的多种金属针灸针（金针）和火罐、夹板、麻线等20余种医疗器具和医用材料。

九、清代（1664年至1912年）

清朝早期，平凉府设医学训科，泾州、静宁州设医学司，掌管药品。官府改革市场管理政策，废止了官方经营药品体制，撤销官营惠民药局机构，放开市场交易，城乡中药店铺林立，交易红火。中期，朝廷在西安设总粮台，在泾州设立粮台分局，将制造、采买、转运、药品经营等局归并粮台办理。晚期，陕甘总督左宗棠指令平凉各州县设牛痘分局，管理牛痘施种工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平凉府首设巡警局，之后各州、县相继设巡警局，后改名巡警道，兼管医药事务。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巡警道实行分科治事，内设卫生科，掌管清洁道路、清理沟渠污秽，考检巡警体格、治疗救护疾病，检查医院诊治、管理市肆药物。城区医药行业自发组织设立药材商会，较大集镇设药材商务分会，协同管理市场药品行业事务。

中药生产技术更加纯熟，中药店铺普遍采用切、碾、磨、蒸、炒、炙等方法加工中药饮片，自制丸、散、膏、丹、酒浸剂等成药。大药铺名大夫从药品采摘存贮、加工炮制、配制汤药到自制成药，讲究因时因地因气候因药性因用途采摘，该用叶的决不用根杆，该用根的决不用茎叶；切割、碾磨中药精益求精，去芯、刷毛、刮皮、斩根、剔梗一丝不苟；炮制饮片恰到好处，如炒黄两面黄亮，炒焦不能成炭，炒炭要存药性，蜜炙要捏之成团抛之即散，务必保证药材的最佳药性；贮藏饮片采用封闭、隔热、通风、

晒、烘、焙、灰封等方法，对近期不用饮片，经干燥后，按药性要求分别装入缸、髹、箱之中，上灰密封，不使透气吸潮。大药店一般设细货房、中货房、粗货房、拣药房、片子房、丸散房、酒房等分类保管药材，小店则分设柜架存放，保证药品的质量。

药品流通仍以中药店为主要形式。同治八年（1869年），平凉城首家中药店“保安堂”创办，任某坐堂行医，经营中药材收购、加工炮制和销售。嗣后，庆春堂、泰和堂、荣盛贵、广德堂、庆余堂、祥盛合等相继开张。其中，庆春堂拥有资金一百万吊麻钱，是当时最大的中药店。光绪年间，刘国珍在庄浪县城开设“永春堂”中药铺，崇信县城开有“德成源”号药材批发店。光绪十六年（1890年），灵台县西屯乡柳家铺“永兴福”药店杨正本配制的祖传秘方“杨氏化癖丸”，用于临床治疗小儿慢性消化不良、贫血症、痢疾、脾脏肿大等病，疗效佳，行销西北五省区，是平凉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中药配方制剂。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平凉城已有中药店10家，崇信县有8家。外地药商在每年春秋二季，来平凉撒货，即推销药物，由药铺开出订货单，带回照单发货，交由运输户转来。丸、散、膏、丹及京广细贵药品，除少数从北京同仁堂、天津威士忌大药店邮购外，大半由售药客肩挑贸易，以陕西、河南药客最多。夏冬二季，专人收款。平凉自产药材行销较远，俄罗斯商人途经平凉经商，向中原输入鹿茸、麝香等名贵

药材，从平凉购买地产大黄、当归、甘草、柴胡、款冬花等药品运回本国。药品商业的发展，使清政府把药材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平凉开征药材统捐税，其税均以担计，每担为240斤，不能成担者以斤计算，值百抽五，年征药味银泾州3.2两、静宁州1.7两、平凉县4.1两、华亭县46.3两、庄浪县2.1两，一律收现银，重税抑制了药品商业贸易的发展。

晚清，平凉群众依靠中医中药解除病痛的格局被西医西药的进入所打破。光绪四年（1878年），灵台县郭家庄（今万宝川）由四川的龙安、山东的曹州等地迁来的基督教信徒，用西药为民治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基督教在平凉东大街建立福音堂，开设福音诊所，天主教在泾川县城和玉都镇开办公教诊疗所。西医西药随基督教、天主教正式传入平凉。当时，市场上西药主要有小苏打、阿司匹林、大圣丹、磺胺嘧啶片、磺胺噻唑片、头痛粉等10多种，价格奇高，但效果好、利病快，逐渐为人们所用，形成了中西药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的现代医药发展模式。

十、中华民国（1912年至1949年）

民国时期，平凉军阀连年混战，天灾人祸，有时地产中药材几乎绝收，外来药品因战争道路中断运不进来，药品发展时断时续。民国元年（1912年），平凉行政专员督察公署设官医局、戒烟局管理医药。民国4年（1915年），平凉各县设土药善后局，征收药味银。民国8年（1919年），平凉警察

署设卫生警察1名，管理医药卫生事务。民国17年（1928年），各诊所药店统一启用新戥秤计量交易药材。

中药店都自己炮制中药饮片，前店开铺，后院加工，最小的药店都有切刀、碾槽、焙锅、晒席等简单工具，祥泰和曾派人去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以及上海、兰州等地名家药厂学习加工技术，配制了黄连上清丸、十全大补丸、麝香冰棚散、梅花点舌丹、冻疮膏等10多种药品，奠定了平凉中成药发展基础。大药店资金雄厚，进货范围广，吞吐量较大，每年收购药材10余万斤，少量用作零售，大部分运往外地或批发给当地中、小药店。民国6年（1917年），瑞典籍牧师多宝在平凉城创办平凉最早的西医美华医院，后改名福音堂医院，设病床80张，用阿司匹林、盘尼西林（青霉素）、非那西林、奎宁、新斯的明、606、早发大安等西药治病。民国25年（1936年），平凉城同仁堂、恒兴、仁和、民生、济生5家西药店相继开张，其中张景堂在北门什字开设的同仁堂西药店，经营阿斯匹林片、盘尼西林、金鸡纳霜、红汞、碘酒等30多种西药。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部分药商相继迁来平凉，芦保番亚东医院、裴晁大夫医院（裴子丰、晁云天）、蒋居敬眼科诊疗所、张憩西医诊疗所、王维勤平民诊疗所等相继开设，平凉城中药店铺由原来的荣盛贵、庆春堂、祥泰和、广德堂、保安堂等10家猛增到38家，自制自练蕾香正气汤、理中汤、四逆

汤、回阳救急汤、雷击散、梅花点舌丹、龟鹿阿胶、五毒膏药、八宝退云散等50多种药品，中药业盛极一时。祥泰和、庆春堂、荣盛贵等一些原来只搞零售或小股批发的药店，迅速发展为大批转运药材的过载商行，进货地点包括成都、上海、北京等15个省市，批发范围扩展到东北、华北、江浙等地，聚成货栈雇用20余人从事药材长途转运。民国27年（1938年），成立了甘肃省第一家红十字会“平凉红十字会”。民国28年（1939年），陈克让等人成立静宁县药材同业公会，为学术团体。同年，平凉县卫生院建立，为平凉第一所公立医院，至民国36年（1947年），各县卫生院相继由中华民国行政院批准成立，医院药械由省政府卫生处不定期拨发。民国29年（1940年）12月，泾川县设立疫苗制造所。《平凉县志》记载，民国34年（1945年），政府组织老药工，对崆峒山药源进行普查，查明药用价值较高、藏量较大的野生中药材有76种。民国37年（1948年），名医孙华堂筹款在菜市巷创办私立平凉华堂国医学校，6名中医任教师，学制3年，实习2年，教授《国医史略》《中医诊断学》《药理学》《细菌学》《历史》《国语》等课程，为平凉培养中医药人才30余名，是平凉第一所私立中医学校。当年，平凉药品集市发展到78个（民国初60个），但中西药品价格奇高，当归每市斤法币2100元、大黄1000元、复方阿斯匹林每片100元、盘尼西林每瓶1.6万元、914每支7000元、早发大安及大健黄每瓶31万元。

十一、当代（1949年9月至今）

1949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平凉分区专员督察公署设立卫生科，管理医药事务。10月，成立西北区山货皮毛公司平凉分站，兼营药品。

20世纪50年代，加强公立医院建设，成立平凉专区人民医院和各县卫生院，建立区、乡卫生所或接生站，成立联合诊所，创办卫校，培训学员；专区商业干校设药材专业班，培训药材加工，针对所患疾病处方配制中成药，缓解了当时缺医少药的现状。成立专区医药公司和专区医药采购供应站，购销中药材30多种2.5万公斤。建成平凉县红旗制药厂，生产酞剂、糖浆剂及头痛散（复方阿斯匹林粉），当年工业总产值7.81万元，平凉药品工业从无到有，开始起步。开展药源普查，查明药源主要分布在大寨、崆峒、麻武、麻川等地，天然生长的植物药材占80%，名优药材有大黄、党参、川芎、柴胡、麻黄、淫羊藿等，仅大黄年产10万吨，出口苏联及香港。1959年，医药界开展“采风访贤，求方献方”活动，征集整理秘方验方937例，汇编成《平凉中医秘方验方汇集》。

20世纪60年代，专区医院制剂室建立，生产大输液和普通制剂；平凉县红旗制药厂与专区医药采购供应站中西药加工厂合并，改称平凉专区制药厂，成立西药车间，生产34种中成药和红汞、碘酒、紫药水3种西药；专区医药分公司更名为平凉专区医药公司，指导各乡镇引种中药材，静宁县种植党

参、南沙参、黄芪、地黄、甘草、杜仲等38种药材。在农村普遍推行“三土”“四自”以及“一根针、一把草”（中西医结合）群众运动，各类药厂发展到70多家，公社卫生院医生“叩门不过三声，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天晴下雨，不计路远与近”，经常深入社队出诊，送医送药到田间、到病人炕头，农村医疗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20世纪70年代，地、县卫生部门开始设立药政科股，办理药政事宜。全区年均种植药材1万余亩，年均收购药材60余种400余万公斤。专区制药厂生产的二益丹通过私人渠道流入德国。1971年，地区肉联厂组建生化制药车间，生产成药3种，半成品4种，后改名为平凉地区生化制药厂，研制生产的人工牛黄荣获全省科学大会奖，被评定为全省优质产品，生化药年产量约1吨，年产值45万元。1974年，全区研制的药品制剂达到120余种。

20世纪80年代，地、县医药管理局相继成立，各县卫生局批准私人开办个体诊所。1987年，地区药检所更名为地区药品监督检验所。1982年，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生产的微波热疗机获国家电子器件总公司科技成果奖（部级）。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地区生化制药厂人工牛黄获全国药品质量评比第四名。建立灵台皇甫谧制药分厂。地区医药公司中药饮片加工厂炮制中药209种，24万公斤，产值24万元。平凉制药厂生产丸、散、胶剂128种，其中元胡止痛片、大黄碳酸氢钠片、维生素银翘片、五加片、参苏理肺片

等产品获“甘肃省优质产品”，五加片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开展第四次药源普查，查明平凉有中药材1000余种、重点品种176种。

20世纪90年代，全区种植药材10年累计达3万余亩，收购中药材累计905.8万公斤，主要品种有党参、地黄、黄芪、大黄、款冬花、柴胡等30余种，华亭县政府把药品作为四个龙头产业之一。全区制药厂年生产各种剂型药品158种、各医院生产制剂121种。平凉制药厂生产的康灵片，经国家卫生部临床验证批准为国家级三类戒毒新药，皇甫谧分厂生产的复方百部止咳颗粒被第八届西部技术交易会评为金奖。1993年，地区医药分公司更名地区医药公司。1995年，地区医药管理局与地区医药公司合署办公，受省医药管理局和行署双重领导。1998年，平凉制药厂加入兰州佛慈制药集团，皇甫谧制药分厂改组为灵台皇甫谧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平凉地区医药公司、静宁县医药公司相继改制为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年至2018年的20年时间里，平凉药品管理部门分别于2001年、2005年、2009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了五次改革。国营医药公司改制为私营和股份制公司，由平凉制药厂改制成的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崆峒分公司、灵台县皇甫谧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通过GMP认证验收，生产的片剂、冲剂、胶囊远销全国20多个省区。通过GSP认证验收药品批发企业有16

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19家、零售药店最多时期达940户。药材种植面积年均达到30余个品种、10余万亩，珍贵中药材有甘肃丹参、玉竹参、南沙参、苦参、关山灵芝、桃儿七等灵台县形成草畜、林果、药材三大产业，以苦瓜、黄姜、板蓝根、柴胡等中药材为主，年产量4167吨，崇信县有枸杞、山芋、杜仲、甘草、柴胡等中药材，药源充足的华亭县形成“东果西药整县牛”的产业格局。实施药品“放心工程”，建立起以政府及部门监管为主线，以药品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协管，以药学会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为辅的“一主三辅”“两网建设”平凉模式。品牌意识进一步提高，“华亭大黄”“华亭独活”取得国家商标局注册，制定《华亭大黄、独活栽培技术》等四项甘肃省种植和加工地方标准。完成第五次药源普查，共采集中药材标本26种156份、腊叶标本22种132份、土壤标本6份，拍摄原生态图片100多张，探明全市主要种植大黄、独活、川芎、山楂等25种。

纵观远古至今漫长岁月，平凉医药发展呈现时多时少、艰难曲折、缓慢发展轨迹，大凡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产力发展、外贸交流畅通时期，平凉医药事业就显得生机盎然，反之则医药停滞、药品产销不稳，药材生产处于低水平自然状态。至改革开放后，医药逐步走向稳定、规范而繁荣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平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开创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的思考

张克非

按：地方志从一本书发展到十业并举，由一项工作迈入一项事业，全国史志工作迈入了新时代。面对新机遇，地方史志工作要主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积极开拓史志编研工作的新领域，全面推进新时代地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方志是地方之全史，中国自古就有盛世修志和重视方志编纂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修志工作更是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形成了很多成规模、高质量的志书。甘肃省在第一、二轮修志过程中，同样成绩卓著。

在网络信息和高科技时代，社会发展变化速度空前加快，人们的实践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新旧职业、工作、行业、企业、组织和知识、信息的更替，以及社会、教育、环境、城乡面貌、人口素质等的变化速度等都空前加快。这必然要求方志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编纂出真实、全面、合理、深入，内容更丰富、可读性更强、更有教益，真正让人民满意的新志书，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和保留、传承、繁荣地方文化、集体记忆，以及促进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对于地方史志事业和史志的编研工作更是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结合甘肃省地方史志工作的基础和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开创工作新局面。

一、总结经验，提高专业队伍素质

在认真做好第二轮修志扫尾、后续工作的同时，发挥方志学会和各级志办的作用，组织方志编修专题项目研究，邀请省内外专家进行专业指导和培训，系统总结前两轮修志的成功经验，加深理解、掌握党和国家对新时期修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探索、研究新中国方志编修事业的客观规律、基本特点、基础性工作和对志书编修人员在政治理论、专业素养和史学功底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为培养新一代、高素质优秀方志人才，迎接第三轮修志工作做好理论指导和前期准备，

确保全省地方史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做好史志编修的基础性工作

坚实、丰富的史料基础，是史志编修工作最为重要的前提保证。史料是人类对自身各方面实践活动的记录和反映。当今各种地方性相关资料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更加广泛、多样，更新的速度也大大加快。各级史志办承担着编年鉴的任务，如果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与政府各部门、档案系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着手创建本地的史志资料数据库，根据编写方志的要求、体系，及时、准确地搜集、补充、完善各种有价值的资料，记录当地各年度在各个方面的重大发展、变化、统计数据，并且围绕重要的人物、事件、时间节点，深入联系、采访相关部门、单位及个人，搜集档案等文字资料，以及相关照片、录音、录像、口述资料等多种形式的文献，尤其是搜集、抢救、保留、整理大量鲜活的个性化珍稀文献，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数字化存贮，建立科学、合理、适用的数据库目录和内容系统。这样做，第一，可以使史志工作者始终保持自身的专业敏感性，切实关注地方历史的方方面面，关注并了解当地重要的事件、单位、工作、个人及其发展过程、变化、感受，成为直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地方史专家；第二，从中可以找到很多值得、需要研究的项目、专题，有助于展开深入研究，开发、编写富有特色、价值的新专题志书，为地方文化、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第三，可以更好地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相关单位提供

咨询和帮助，发挥方志工作的顾问和智库作用；第四，能够为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确保届时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大型志书的编修任务。因而，各级史志部门，都应该切实重视地方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这一基础性、关键性工作，并且作为考核各单位、每个人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如果上上下下长期坚持、久久为功，一定能够全面提升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整体业务水平。

三、主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

史志工作的重要性虽然表面上谁都不会否认，但实际上却有很多人难免或多或少将其当作无足轻重的边缘化工作，尤其在不是大规模修志的高潮期间，其重要性更容易被忽视。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人对历史，尤其是地方历史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在于各地的史志机构、史志工作者自身缺乏积极、主动作为的意识及相应的成效。编修志书从古到今都是政府行为，在今天，它必须也完全有可能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需要从这一根本任务和要求出发，紧密结合史志工作自身的特点，增强政治、大局和责任意识，高度关注国家战略、地方发展和民众的需要，思考、选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需要与我们工作的契合点与突破口，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积极拓宽工作领域，主动做好地方史志的编研、服务工作。以近期国家战略和全省中心工作为例，围绕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文

文化旅游等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史志工作有内在联系，需要我们发掘、宣传地方史上与之有关的人物和史实，讲好这些方面的故事，为促进这些重要任务的完成，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增添精神、文化动力，有效开拓史志工作的新局面。通过“有为”，实现“有位”和自身的重点突破、全面发展。

四、积极开拓史志编研工作的新领域

第一、二轮方志编修工作，已经根据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科技等特点，以部门、行业等为基础，创立了许多新的志书类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当前，我们完全可以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根据国家战略、地方需要，学科、专业和观念变化，产业更新等，进一步探索、创新各种专题型志书及其编研工作。如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编写方志中的丝绸之路与甘肃、甘肃丝绸之路志等；结合全省红色文化资源的禀赋及开发，编写全省和各地的红色资源志；服务扶贫攻坚战略任务及实践，编写全省和各地的脱贫致富志；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编写生态保护志、祁连山志、江河流域志、林草植被志等专业志；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编写与互联网、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有关的产业志；服务于文化传承，编写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

志、历史文化资源志、企业志、乡村志、学校志、著名家族及家教文化志等。这样一来，既大大拓宽方志工作的范围、领域，又密切与政府、社会及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史志工作更好地贴近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和民众需要，并由此进一步开发出体现地方历史、文化、人物、故事的各种相关文化和精神产品，繁荣、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等新产业。要实现这些创新，还需要史志工作者自身加强学习，开阔眼界，更新知识结构，了解、掌握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方法。同时，善于与各种单位、各方面人才密切合作，适应其需要，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探索建立新的互利双赢合作机制。

总之，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史志工作，中宣部、历史研究院都新设立了专门的史志工作管理、研究机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史志工作本身也更加需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紧紧把握时代的脉动和需要，通过不断努力、创新，全面提升编研工作的水平，编纂出无愧于时代的地方史志精品新作，忠实、全面记录地方的历史变化、人民的奋斗贡献、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要，也是地方史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浅议地方综合年鉴条目关联

常登成

内容摘要：年鉴条目设置关乎编纂质量。地方综合年鉴有别于专业年鉴，条目更为丰富多样且相互关联，编纂过程中要科学合理设置条目，处理好相互关系，使其层次清楚、编排有序。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 条目 关联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中指组字〔2017〕6号）明确要求：年鉴框架结构一般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年鉴内容记述应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一般以条目为基本记述单元。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综合性决定了其条目的复杂性和条目设置的统一性。条目设置直接影响综合年鉴编纂质量。

综合年鉴的条目有其独立性，通常是一事一条目，单独记述单独存在。但笔者在具体编纂综合年鉴的过程中体会到，若从一部年鉴的整体性统筹考虑，条目的独立性主要是以其所属层级及记述内容相对而言的。作为类目、分目下的条目之间也不是互不相关，互相割裂，而是相互联系，互有影响。因此，在设置的条目和具体编纂过程中，既

要注重每个条目的设置，还应统筹考虑与其他条目的关系及其顺序、内容的详略等相关因素，使其归属得当、科学合理、精炼统一、记述明晰，避免简单化和随意性。

具体而言，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时，在合理分设类目、分目的同时，条目之间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总体与个体的关系

总体统领个体，先总体后个体，个体不能包含总体。地方综合年鉴的条目有的是综合性条目，记述内容反映的是总体情况或综合性概况，如“年度概况”“生产经营”等；有的条目则是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单一明了，如“年鉴编纂出版”“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等。这些条目设置时应处理好综合与分项的关系，避免相互穿插，记述混乱；并将综合性条目置于单一性条目之

前,不宜倒置。单一性条目中也不宜记述综合概况事项,如“内设机构”条目中不出现单位设立及其沿革、机构改革的内容等。同一单一性条目在各个类目、分目下尽可能避免重复设置,如许多分目下若同时出现有关体育赛事的记述,则直接以具体赛事名称设条目,不宜在各分目下重复设置“体育赛事”条目。

二、处理好主要与次要的关系

先主后次,主次分明,详主略次,不能喧宾夺主。地方综合年鉴中有的条目反映的是重点内容、重大事项、重要信息,如“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重点领域立法”等;有的则记述的是常规工作、通常事件、普遍现象,如“队伍建设”“文化活动”“社会服务”等。这些条目设置时应先主后次、主次分明,突出重点、简记一般、有详有略、详略得当。有些业务单位的年鉴稿中把“党的建设”条目列在第一顺序大写特写,从“领导重视”“组织机构”“理论武装”“党建工作措施、成效”“活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到“两学一做”等专项活动开展,记述无不细致详尽,而对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及其特色、亮点等方面概而记之甚至泛泛而谈,重点不突出,特色不明显,主要数据不全甚至不作统计,条目设置及其记述简单化,质量不高。这样的条目设置及其记述无疑会影响到整体结构乃至整部综合年鉴的质量。

三、处理好平行与关联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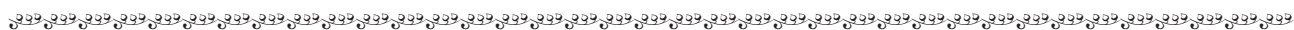
相对专业年鉴而言,地方综合年鉴的条

目更丰富,条目之间的关联度更高,影响条目设置质量的因素更多。置于地方综合年鉴类目、分目之下的条目既有其独立性,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类目、分目的具体内容。有些条目看似是平行关系,但联系类目架构综合考虑,同一类目、分目之下设置的各个条目之间都有关联。乃至不同分目、不同层级下的条目甚至也有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联系,都是一部综合年鉴整个篇章架构的组成部分。如“教育”类目“某中学”分目下的“校园安全”条目与“综合管理”类目“安全监管”分目下的“安全事故防控”条目,虽然各自领属关系不同,所处层级位置各异,但又密切相关,相互影响。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很多。如果把类目比作一棵树的主枝,分目就是侧枝,条目就是树叶。一棵树上所有树叶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共同作用才能合理通风透光,更好地合成养分,更好地保证枝、干乃至整棵树的生长。因此,编纂过程中,条目之间的联系不容忽视。应统筹考虑,合理安排设置条目,使其覆盖全面、层次清晰、领属得当、排列有序,增强综合年鉴内容的整体性、记述性。同一类目、同一层级下设置条目尽量少用相同名称命名,力求简洁、新颖、准确。不同类目、不同层级中的相同条目要设置精准,记述内容的侧重点要有所不同。相同条目在不同类目中所处的位置应大体相当,记述要突出主题、详略得当。条目之间相互呼应,共同为一部综合年鉴的篇章架构服务,从而使整部综合年鉴质量更高、更有特色。

时值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全力落实《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全面完成“两全目标”的关键时期和冲刺阶段，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既要抢时间、赶进度，确保全覆盖，也要重质量、出精品，从地方综合年鉴篇目架构全局出发，

科学合理设置好条目，统筹考虑处理好条目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水平。

（作者单位：张掖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天水市秦州区《秦州地情丛书》第二部出版发行

2019年9月15日，《秦州地情丛书》第二部出版发行，由《秦州名胜》《秦州古陶》《秦州记忆》《秦州灯谜》组成。秦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依托区内地方文化资源，2017年2月启动编纂《秦州地情丛书》第二部，2018年7月底完成初稿，经6次修改完善，2019年3月邀请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了评审。

《秦州地情丛书》第二部是对源远流长的秦州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集资料性、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寓知识性、可读性、科学性于一身，以发掘秦州历史文化资源为切入点，以重点介绍、突出特色为遵旨，将秦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在读者面前，对宣传秦州、推介秦州、提高秦州的知名度有深远的影响。

（天水市秦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供稿）

甘肃抗日功臣朱青选、唐国桢夫妇

朱毓麒

按：甘肃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要的政治军事基地，在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甘肃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日救国，涌现出许多革命英模人物。民主人士朱青选爱国不惧生死、做官刚直不阿，夫人唐国桢为国为民，为抗战做出积极贡献。

朱青选（1897-1935），字万卿，甘肃天水市麦积区石佛镇朱家庄人。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志向高远。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家寒复转兰州师范。民国12年（1923年），国民政府在甘肃选拔赴日本留学生，朱青选以首名考取，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纺织科，民国16年（1927年）毕业。继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习经济学，民国19年（1930年）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民国23年（1934年）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朱青选在日本留学期间，敬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因德才兼备，担任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朱青选激愤异常，9月20日即以东京支部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召集各级党部、常务委员召开谈话会，要求联络消息，搜集材料，互相督勉，努力唤醒国人的抗战

10. 国民党驻海外支部为“九一八”事变请积极准备抗日的文件

（1931年9—10月）

（1）中国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呈（9月20日）

呈为建议事：窃日军捏造事实，侵占我东北各都市、要塞，并毁我兵工厂、飞机场，居心叵测，破坏国际大局。驻东全体党员愤激异常，由本会召集各下级党部、常务委员谈话会，除注意联络消息，搜集材料，互相督勉，并唤醒国人外，议决：

1. 此事应由中央政府交涉，决勿认为局部问题。
2. 请饬令外交部即转令驻日公使，向驻日各国公使连络。
3. 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
4. 彻底对日断行经济绝交。
5. 根据华府九国条约，要求美国主张公理。
6. 作对日战争的准备。

等六项均属切要问题，特遵案备。又呈请钧会俯予采择施行，实纫党谊。谨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
会常务委员 朱青选

九、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照片

意识。同时，一致通过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请积极准备抗日的呈文，文中请求“由中央政府交涉，决勿认为局部问题”“请飭令外交部即转令驻日公使，向驻日各国公使联络”“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等，由朱青选代表东京直属支部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

据曾任第六届民革中央顾问、北京中山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杨玉清撰文回忆：1932年春，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当时正是日本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卧病在早稻田大学门前冈崎医院。当时国民党驻东京支部负责人朱青选到医院看望我，曾告诉我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们在日本和犬养毅有关系的人，就时常去包围犬养毅，说‘旁人作首相，使中日方面发生这些事情，还没有什么；而今天是你作首相，偏偏使中日方面发生这种事情！你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你是中山先生的老朋友，你一向是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的。为什么在你做首相的时候，偏使日本军人肆无忌惮，而发动这样一桩侵略中国的行动！这件事如何下台，你总得想个办法。’”犬养毅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一定想办法，使这件事消灭于无形。在中国的东北，要釜底抽薪，把闹事的一股日本军人调回国来，每人加一级，然后再调一批较好的日本军人到中国东北去。同时中国方面，也一定要撤换张学良，使日本军人再没有闹事的借口。当然，希望由一个日本方面比较熟悉的人去作中国东北边防司

令长官。’”（见杨玉清《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犬养毅不久果然有了行动，他背着军部派心腹萱野长知作为密使到上海去和蒋介石接头。可惜未逃过日本军人的耳目，没有等计划成功，犬养毅就被军人刺杀于首相官邸。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有勇气、有能力当面找日本首相犬养毅进行义正辞严的投诉、抗议，并且让犬养毅答应“一定想办法，让这件事消灭于无形”，且有所行动的人，在全国为数不多，更是甘肃抗战史上值得浓重书写的一笔。

朱青选搜集到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大肆侵华的重要机密材料，不顾个人安危，以回国催促学费为名，急告国民党中央当局，受到嘉奖，荣记一等功。

民国23年（1934年），朱青选谢绝早稻



抗日一等功臣朱青选

田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回到中国。翌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8月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指导委员。朱青选到任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曾多次公开发表演讲，表明要遵循孙中山的遗嘱，坚持新三民主义，对内唤起民众，扶助工农，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马鸿逵的军阀统治、专横拔扈，深表不满，政见不和。

同年10月，朱青选回乡探亲，目睹了家乡人民的苦难生活。回到宁夏后，与马鸿逵等人的矛盾更加尖锐。11月，因患感冒用药之际，被人投毒暗杀。朱青选逝世后，蒋介石亲笔书送挽幛“典型足式”，于右任题书“积厚留光”，邓宝珊题挽“党国失柱”表示哀悼。朱青选的灵柩由银川运回家乡，途经兰州，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军事长官邓宝珊主持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回乡安葬时，乡绅清代举人谢廷楠题赞：“卓劳英姿，敢作敢为。领袖民党，博学宏词。便服异言，侦探敌谋。走告国难，未竟壮图。”

朱青选的妻子唐国桢，湖南衡山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日本明治大学研究生。先后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理事、宁夏女子中学校长，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妇女界成立“中国妇女慰问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唐国桢出任总干事。此后，唐国桢多次率领妇女界代表赴前线慰劳参战将士，鼓舞士气。



1945年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劳军团至印缅战区慰问远征军，一排右二为唐国桢。

1938年2月，国共两党联合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唐国桢、邓颖超、史良、黄卓群等17人任常务理事。保育会年需经费100万元，主要依靠募捐。抢救难童工作伊始，唐国桢将朱青选的抚恤金全部捐赠给“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四处奔走募捐，做了大量的工作。抢救难童工作，历时8年多，抢救难童3万多名，被誉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创举”。

民国27年（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举行妇女领袖会议，商讨抗战时的中国妇女工作，邀请了48位妇女代表参加谈话会，唐国桢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会后，唐国桢按照会议做出的两项重要决定，投身抗日建国工作，号召组织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开展募捐、慰问抗战将士等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10日为抗日有功人员颁发抗日胜利勋章，被授勋者有国民党军政要人、

八路军及各党派知名人士 1000 多人。妇女界和“战时儿童保育会”29 人获殊勋，唐国桢亦在此列。唐国桢后任全国妇联会主任，中央立法委员。全国解放前夕至台湾，后病逝于美国。

参考文献：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27 页。

[2] 《团结报》，1993 年 3 月 3 日第 2 版。

[3] 《天水县文物志》，1984 年版。

[4] 《北道区志》，2000 年版，第 920 页。

[5] 《天水文史资料》（第七辑），1994 年版，第 226 页。

[6] 《天水名人》，1998 年版，第 292 页。

[7] 《天水名札》，2005 年版，第 111—1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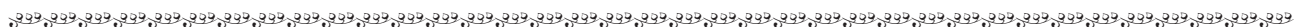
[8] 《天水通史》，中华书局 2014 年 6 月版，第 475—478 页。

[9] 《民主协商报》，2010 年 4 月 16 日第 3 版。

[10] 《陇原抗战烽火——甘肃抗战史料选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69 辑），2015 年版，第 419—422 页。

[11] 《炎黄》，2010 年第 7 期，第 112—119 页。

（作者单位：天水市麦积区教师进修学校）



甘肃省 6 部年鉴获第六届全国地方志 优秀成果（年鉴类）通报表扬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学会组织开展的第六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审工作中，甘肃省 6 部公开出版的 2018 年卷年鉴经评审，受通报表扬（中指组字〔2019〕8 号）。一等年鉴：《安宁年鉴》；二等年鉴：《凉州年鉴》《秦州年鉴》《山丹年鉴》；三等年鉴：《西峰年鉴》；提名年鉴：《天水年鉴》。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李佳潞供稿）

幸邦隆与华亭史志

严世文

按：幸邦隆是华亭近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且通晓经史，著书立说，一生著述11部（现仅存3部）。历时20余年，编纂《增修华亭县志》，该志是华亭有史以来体例最合理、内容最完整的志书，是追溯华亭历史渊源、了解风土人情、探究地理物产的重要书籍。

幸邦隆（1879-1951），原名幸国麟（霖），子中和，曾名玉堂。祖籍陕西凤翔，光绪五年（1879年）生于华亭县南安里9甲（今神峪乡庙湾），早年移居华亭县南川乡武村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先后在华亭仪山书院、柳湖书院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举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甘肃优级师范学堂博物科攻读预科及本科。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旋即归里，致力于发展华亭教育事业，在乡村创建小学，在县城创建高小（华亭一中前身），注重女学，提高儿童入学率。

民国6年（1917年），国民政府内务部会同教育部通令各省飭属县续修新志，时任华亭县长郑震谷两次照会时任平凉中学校务主任的幸邦隆担当修志重任，幸邦隆欣然答应，并开始收集资料。后因郑震谷于次年擢升天水，修志工作就此搁置。民国18年

（1929年），甘肃通志馆成立后，委任幸邦隆为通志副采访之职。同年4月，要求各县普修县志。华亭县政府在教育局附设修志局，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幸邦隆兼任修志局局长兼县志总编。时华亭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幸邦隆又左脚跌伤骨折，在困难面前，依然夙兴夜寐，放弃薪酬，潜心编纂，历时4个月，纂成《增修华亭县志》初稿。

悉心考证。一部志书，贯通古今，涉及范围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是全面反映一个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物产、风俗、人物以及重大事件的百科全书。要完成“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县志，不仅要有博览群书的渊博知识，纵览全盘的宽阔视野，而且要具备精益求精、勤奋笃学的钻研精神，更要有无私无畏、严谨治学的坦荡胸怀，事实证明了幸邦隆具备这样的学识和人品。幸邦隆通读了《兰州府志》《皋兰县志》《平凉

府志》，知悉志书在见证一个地方历史沿革，真实记载当地文化、物产、风俗、人物以及重大事件、追根溯源的重要性。在搜阅华亭自清朝顺治、嘉庆以来由佟希尧、马魁选和赵先甲等学者编修的《华亭县志》与《新集华亭县志》残卷的基础上，对历史重新勘正。风土民俗坚持亲闻、亲历、亲听，道听途说的轶事不记；逢山脉地理认真考究起源，遇到水系河流实地勘察源头，没有考证依据的事实不摘；对于名胜古迹、道观寺庙更是刨根问底，通过读碑文、看楹联、查钟鼎香炉进行印证，向僧人请教，了解其中鲜为人知的历史。不论走访知情人还是实地查验印证，幸邦隆均详细记录。而后相互比较，摘录精华，对合理恰切的论断继续沿用，又勘校补充新颖的观点。

创新体例。从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至清宣统年间（1909-1911年），有地方官吏或乡贤达人五修华亭县志，有的未见传本，有的体例和内容比较简单，有的仅存少量残篇，人们对华亭的自然状况、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的脉络难以总览全貌。《增修华亭县志》序言就写道“粤稽华亭自隋置县，迄于民国。已千数百载矣，此其间政教之良窳，风俗之厚薄，民生之荣枯，疆域之沿革以及社会之背景，皆因文献莫徵之故，无可表见于世，此家伯所为长太息也！清同治回匪乱后，耆老凋谢，田庐丘墟，华亭掌故，益湮没无闻矣！前虽经宿儒曹麒，广文赵先甲等之博访周咨，集有简编然，皆体例不完组织无方，而于民生风土政教之要领，皆疏漏不

详，至于山脉水道又复割裂零乱系统源流多有未备。后之人欲周知地理往事之实，岂不难哉！”

幸邦隆为了摆脱以往县志的陈旧体例，打破传统的模式，在认真考证、慎重甄别的基础上，借鉴先前县志的精华纲目，对已有县志纲目合理取舍，重新设置布局，取得了编排科学，内容完整，纲举目张，条目清晰的效果。在《增修华亭县志》序中写道：“华亭修志之人元以上虽不可考，究之现行录本，实明嘉靖十四年，乡贤曹麒所修，其结构多本赵俊谷之平凉志，清顺治间，贤宰佟希尧重修于前，乾隆时训道赵先甲增订于后，咸丰时邑绅石元煦、袁栋、赵汉弼等校序于终。华亭往事，东鳞西爪，不致湮没者皆以上诸公之力也。”。民国18年（1929年）11月底完成县志初稿八编。经过两个月的誊写、整理，于民国19年（1930年）春邮寄省通志馆审阅，经过长达两年审阅，得到省通志馆的赞赏，训令曰“编辑迅速，勤劳卓著，殊堪钦佩”。民国21年（1932年）4月，《增修华亭县志》初稿及删改修正意见邮回华亭。时任县长张次房十分重视，旋即成立县志审察委员会，抽调6人，按“披阅内容，分门别类，纂录详实，至其文笔之雅洁”的要求认真审阅，历时一月。对省、县两级审察中提出的意见，幸邦隆一一采纳，及时补正，又补充记述了这三年间发生的大事，最终确定十编，后附轶事三则、志余四则、祝词四则。以编系目，繁目附类，并加总分舆图于首，官俸、学校财政一览表于

中。对审察中提出的32条不正确意见，写《驳县志审察长谬误的一个重要说帖》一一辩清，众人心悦诚服。张书绅在《增修华亭县志》序言写道“幸中和君修华亭县志，脱去旧史的体裁，演出新史的色彩，处处古今对照，把民族的竞争，民权的消长，民生的休戚，物质的进化，都归纳在一部地方史中，这也是县志里头罕见的了。”翌年5月1日，《增修华亭县志》正式印付。

培养编修人员。县政府设立修志局，安排3人为专职采访员，没有交通工具，采访只能徒步出行，往往是早出晚归，不辞辛劳，采访进度仍然很慢，难以如期完成编纂任务。幸邦隆采用聘用兼职采访员的办法，吸收38人为兼职采访员。这些人员文化程度上至贡生，下到高小毕业，既有前清儒学训导、教师、校长，又有议员、保卫团长、商会会长及邑人，接触面广，且有一定的调研能力和写作功底，资料收集的采用度较高。兼职采访员分布于华亭各地，可以就地采访，减轻劳顿跋涉之苦。此外，幸邦隆还挑选了3人负责绘制图表，5人负责校对，7

人兼任誊录。以其个人威望号召大家以报效桑梓为旨，发扬“病不辍笔，劳不取酬”的精神，踊跃接受任务，积极认真开展工作，形成了一支专兼并重，务实肯干的修志队伍，加快了县志编写进度，保证了县志快节奏、高质量的完成。

《增修华亭县志》是华亭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县志，为世人了解华亭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实资料，曾流传到东南沿海地区。但由于各种原因，遗失较多，华亭及周边地区藏量很少。20世纪70年代，台湾编辑出版《中国方志丛书》中，幸邦隆总纂的《增修华亭县志》被列入其中。1976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海内外，出版时书名删去“增修”二字。甘肃省图书馆和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均收藏了该版本。民国23年（1934年），幸邦隆辞职回乡，编纂了《续修华亭县志》，记载了民国22年（1934年）以后华亭县的变化及重大事件，惜手稿于1951年后遭毁。

（作者单位：华亭市地方志办公室）

《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先生纪念碑》及其人其事

张国藩

按：金品三，英国人，是甘肃大麻风病防治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本文通过对《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先生纪念碑》的释读，依据现有资料，记述博德恩医院来历及金品三开办甘肃第一家大麻风病院，救死扶伤、跳筏救人的事迹。

一、碑文

碑阳：

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先生纪念

天水县教友和全省士绅姓名46人（略）

碑陰：

□□□，字玉堂，英国苏格兰人。乃侨居中国。基督教徒，以医为业。先生天性明慧，爱为怀。肄业哀丁□□调摄按摩、剖解化验，一切□□老幼□□诸手法，靡不研究，□有心得。年二十五授医学士学位。□然□□世远来中国行其道□□藐也。宣统三年始游□□□之开封，居福音医院。民国元年复传之平阳，立善胜医院。学术日富，名誉日增。尝以中国西北诸省地睹边□，幽岩大漠间，寒暑凝郁。腥膻传□□不治之症。今欲淪新理，必求实效。欲覘实效，必扩教科。次年秋，遂来兰州。就凤林关左背山面河，创建□□□□□周密，轩扉之洞开，药

俾饮饌之具陈，刀圭仪器之清洁；而且亭皋
 爽垲，花树缤纷。俾病者夷旷□□□□□生
 机，陇之民悦服，信从者实基於此。导河逼
 邻番境，先生考察民瘼为之惻然，乃立福音
 医院□□□□中□设大麻疯病院。麻疯，毒
 疾也，患者形骸辄如蛆食蜗蝟，十不活一。
 先生治之活之者众。嗣□渡□□□班授医毕
 业者百余人，若汉、若回、若蒙藏，其食德
 饮和生死肉骨者不可以数计。於庠厥功伟□
 □陇宁不靖，兵燹□惊。英国领事电令交
 驰，促装归国。外侨旅兰者结木筏，顺黄河
 相率取道绥远以东□□□所属之张家坳筏
 户，以沙石洲旋涡告。先生慨然曰：“吾侪
 迫於切令，急於星火，未敢蹇滞也。”遂举
 □□□□（缺十数字）奋跃中流，就浅就
 深，或推或挽。同行七筏，已驶其六，其最
 后者牵缆突断，拽助弗及。骇浪相触，虽□
 □□□强义气之壮而已！叹灭□於凶波，沉

遗骸於恶水矣。此六月五日十一时也。於庠悲哉！先生□□□□平，抱仁而居，戴义而处，慈善及於人，忠厚尽於己，何天不假年，而逝者如是乎！□□□等瞻望□□□□先生之闾生。先生之龕而为之伫立，以泣永矢费谥者也。先生有子二，长名□，次名□，若□□□□□□用附记之，以告来者。

夏历丁卯八月二十日，即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立石

□务处长、山西王学伊拜撰

前法部主事、皋兰卢应麟拜书

二、碑刻形制及博德恩医院木楼现状

纪念碑于民国16年（1927年），立于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博德恩医院木楼”东侧，碑高130厘米、宽82厘米、厚15厘米。底座高32厘米、长145厘米、宽88厘米。碑上部左右角缺损，碑面缺字较多，碑断为数块，粘连修复重立，玻璃罩防护。碑阳正中竖刻“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品三先生纪念”，字径10×6厘米，左右分刻天水县教友和全省士绅姓名46人；碑阴280字，19行，满行15字，均楷书。碑文记述金品三传教、办医院、木筏救人遇难之事。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木楼是博德恩医院旧址（又称“兰州福音医院”），今保存完好。木楼口朝北，门上悬“博德恩医院旧址”匾，7字，楷书。门口立有文物保护碑：“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立”。过堂东西两壁悬挂照

片、文字、木匾，供人们瞻仰。在八角楼东北立有一碑，高95厘米、宽55厘米、厚15厘米；底座高21厘米、长115厘米、宽80厘米。碑阳额刻一“金”字，字下左右分刻“海”“莲”2字，楷书，字中刻“IN”，正文为英文，10行。可能是金品三衣冠冢。博德恩医院创建于民国4年（19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该址设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医院来历及碑主事迹

1. 博德恩医院

博德恩医院由内地会早期传教士威廉·博德恩的遗产捐建。

威廉·博德恩（1887—1913），家境富有。1904年，高中毕业后曾游历中国。1909年博德恩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内地会”，1912年出发前往中国甘肃，取道埃及学习阿拉伯文，因患脑膜炎病逝，年仅25岁。去世前，博德恩将全部遗产捐给“中国内地会”。由金品三负责修建了一处医院，起名“博德恩医院”。

2. 金品三创建博德恩医院和大麻风病医院

金品三（1887—1927），字玉堂，英国人，光绪三年（1877年）11月20日出生于陕西汉水一只行船上。其父金辅仁是“中国内地会”早期的传教士之一，于光绪元年（1875年）7月14日抵达中国，先后在甘肃、陕西和湖北等地工作。光绪十九年（1893年），金辅仁首次携眷返英述职，因看到中国医疗宣教的需要，回国后即进入医学院学

习，经过六年苦读成为正式医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金辅仁以医疗宣教士身份重返中国，被派往山东烟台，担任“中国内地会”芝罘学校医院驻院医生，金品三也随之进入芝罘中学求学。金辅仁于1902年退休，金品三随父母回到英国。

宣统三年（1911年）1月3日起，金品三先后到河南开封福音医院、山西平阳善胜医院开展医疗事业。民国3年（1914年）2月，金品三带着威廉·博德恩的遗愿和捐款（博德恩母亲捐款，“中国内地会”监管）前往兰州兴建博德恩医院。他在兰州黄河北岸庙滩子买下一大片土地，修建一栋手术和化验用的砖木结构主楼（俗称木楼），有病房100多间，成立了一家集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兼具的西医医院。为纪念捐建者的善行，医院创建时就定名为“博德恩医院”。民国7年（1918年），医院建成，邀请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广建揭匾。建院初期，医院分男、女二部，有男病床80张、女病床40张，还特别设立了穆斯林病房。金品三担任博德恩医院院长，一方面主持院务，另一方面培训中国医生。全院有英、美、德、澳外籍医生十余人，国内医生、护士四十余人。在医疗技术上能剖腹摘瘤，在中国西北属少见。此外，医院还开办了护士训练班，开设了医学专科（学制8年），毕业后即可获得医师资格。由于医院体恤民情，在回、汉、藏民中享有很高的赞誉。金品三罹难后，继任院长为侯文辅，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全院有外国医师10人，护理人员10余人，病

床百余张，从国外购得放射仪器，自河南开封福音医院增调部分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医疗水平大幅提升。

当时，甘肃贫瘠，传染病肆虐，其中尤以麻风病为甚，广河（旧称导河县）一带麻风病患者十不活一。医院开办不久，麻风病人越来越多。金品三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和政、广河等疫区，调查研究。在伦敦国际麻风病救济会的支持下，民国14年（1925年）在医院西端设大麻风病院，翌年建成营运，收治麻风病患者，十余年间活着甚众。同时，培训疫区回、汉、藏医生百余人。从市第二人民医院根据老人回忆绘制的“博德恩医院分布图”来看，当时医院还在山坡建有住院部，呈两排分布，左排为普通病房，右排为传染病房。大麻风病院的管理者几经更迭，分别由英、德、美籍医生负责。有病床60张，设有普通病房，重病诊疗室、诊断室、化验室、治疗室，有专职护士为病人提供护理服务。

据《甘肃省麻风防治史略》载：金品三创办的大麻风病院是甘肃省第一家麻风病防治医院，为此后在全省开展麻风病防治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1952年，甘肃省在此基础上成立兰州麻风病医院，半年内麻风病人迅速增加，甘肃、四川、青海、西藏、新疆及西北军区的患者蜂拥而至，至当年4月底，医院收治麻风病人109名。后兰州麻风病院整体搬迁至临夏专区和政县吊滩乡吊滩村境内，承担全省麻风病防治工作。

3. 金品三罹难过程

碑文记载了金品三罹难过程：民国16年（1927年）6月5日，北伐战争爆发后，金品三奉命率全省外籍人员结木筏取道绥远撤退到沿海。筏户告以石洲旋涡难行，金品三说：“令如星火，不敢耽搁。”便分乘7艘大型木筏沿黄河顺流而下，途经兰州什川河段，木筏全部搁浅，金品三下水奋力抢救。前面6艘顺利下行，其乘坐的最后一艘牵缆突断，拽助不及，与骇浪相触，金品三被漩涡吞噬葬身黄河。金品三为救人而死，在中国救死扶伤16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碑文评价道：“（先生）抱仁而居，戴义而处，慈善及於人，忠厚尽於己”，诚恳之言也。

四、撰者与书丹者简介

书丹者卢应麟，字子昭，皋兰县（今兰州市）人。清法务部主事。入民国，任甘肃省议会议员，协助刘尔炘兴办社会福利。精

书法，民国5年（1916年），刘尔炘《果斋前集》出版，卢应麟题写书名，谈风鸣作序。兰州庙宇有其撰书楹联。

撰文者王学伊，山西文水人。精书法。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固原直隶州知州兼固原学正，捐廉创建固原中学堂，编纂宣统《固原州志》。民国2年（1913年）升任泾原道。后任兰州警务处处长、甘肃省会警察厅厅长。

参考文献：

[1] 李忠诚：《甘肃省麻风防治史略》，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12月，第27—29页。

（作者单位：甘肃省交通科技通信中心史志编纂处）